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目錄

文獻的搜集與解讀

謝蘭生《常惺惺齋日記》與嘉道間廣州城市生活一覽

- Steven B. Miles(麥哲維)

僑批經營研究的若干問題

——從 1887 年廣惠肇文興信局的創辦廣告談開去

- 陳麗園

閩西四保地區所見五種祭文本

- 劉永華

田野考察筆記

回憶田野工作

- 黃淑娉

香港歷史的教與學

從路邊到展廳——碾布石

- 香港歷史博物館民俗組

活動消息

《歷史人類學學刊》

徵稿啟事

1. 《歷史人類學學刊》由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聯合主辦。
2. 本刊發表具有人類學視角的歷史研究和注重歷史深度的人類學研究論文。
3. 本刊為半年刊，定期在每年四月及十月在香港出版。
4. 本刊實行匿名評審制，所有發表之論文均須經兩名或以上評審人審閱通過。文稿中請勿出現任何顯示作者身份之文字。
5. 本刊發表論文稿件一般不超過三萬字。書評稿件不超過三千字。
6. 來稿請注明中、英文篇名、作者中、英文姓名、所屬院校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並附中英文摘要各約300字及中英文關鍵詞各5個。
7. 來稿以打印稿為準，同時敬希作者盡量通過電子郵件提供文本格式之電腦文件。
8. 本刊不設稿酬，來稿一經採用刊登，論文作者將獲贈該期學刊5本，書評作者則獲贈兩本。
9. 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
10. 作者投稿前，請自留底稿。投稿後一般會在兩個月內接到有關稿件處理的通知。為免郵誤，作者在發出稿件兩個月後如未接獲通知，請向編輯部查詢。
11. 本刊編輯部設在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聯繫方法如下：

郵政地址：中國，廣東省
廣州市新港西路135號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歷史人類學學刊》編輯部
郵政編碼：510275
電子郵件：hsslzw@zsu.edu.cn
電話：86-20-84110305
傳真：86-20-84113308

謝蘭生《常惺惺齋日記》與嘉道間廣州城市生活一覽¹

Steven B. Miles (麥哲維)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所藏《常惺惺齋日記》(以下簡稱《日記》)是部很有價值的史料,具體而生動地描寫了十九世紀初期的廣州社會菁英文化(elite culture)。雖然這部珍貴的文獻還被收錄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但據我所知,此書仍未受到研究者應有的重視。我認為《日記》對於日後有關廣州地方文化史以及清代城市紳士生活史的研究將有不少助益。所以,於這篇文章中,我想簡略介紹這部廣州地方史的資料,同時談談它對於幾方面特別有用之處,並在每一題目舉幾條例子。

謝蘭生(1760-1831),字里甫,南海縣麻奢堡人,僑居廣州新城的素波巷;稱他書房為「常惺惺齋」。謝蘭生於1792年中舉人,1802年中進士;但是在其父親於1806年去世後,謝蘭生絕意仕途。之後,在廣州歷任粵秀和越華兩書院山長。1820年廣州府知府羅含章建羊城書院,延謝蘭生為山長。於是謝蘭生自1821年開始,一直在該書院任教。謝蘭生於1831年在該書院去世。

《日記》是未曾出版的稿本,一共有十冊。其中幾冊缺乏題目。不過,根據內在的證據,我們可以斷定每冊的內容如下:

冊號	年份
第一冊:	嘉慶二十四年(1819)(嘉慶二十三年臘月附入)
第二冊:	嘉慶二十五年(1820)
第三冊:	道光元年(1821)
第四冊:	道光二年(1822)
第五冊:	道光五年(1825)
第六冊:	道光三年(1823)
第七冊:	道光六年(1826)
第八冊:	道光八年(1828)
第九冊:	道光九年(1829)
第十冊:	道光四年(1824)

與一般日記的稿本不同,《日記》簿子有預先印刷好的欄位。每頁分為十條(上下各分為五條)。每一條的上面有一個「日」字;要使用簿子的時候,書寫者可以填入某日。每日空格下再分四欄:題為「早晨」、「中午」、「下午」、和「燈下」。此外,每頁頁眉有空白處,供書寫者任意描寫各項事情,例如當日的天氣。但是,謝蘭生在寫日記時經常會超出預先印刷好的欄位和題字,對讀者造成一些閱讀上的困難。《日記》原文並未標點,此處標點是我所加。

茲分類摘錄若干條,藉以介紹《日記》的大致內容。

(一) 文化交流的場所:洋行與海幢寺

在十八、十九世紀時,廣州十三行的行商和廣州的鹽商在廣州學界活動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此是大家所共知的。不過,《日記》更顯著地反映了學人謝蘭生與怡和行伍氏等大商人之間的密切交往。在《日記》中,讀者會發現廣州伍氏、葉氏、潘氏諸商人的園林和祠堂,都被當作極其熱門的文化交流場所:

嘉慶24.7.16 ²	過伍祠 ³ 送喜……。
嘉慶24.7.17	附伍平湖 ⁴ 船往花地,送阮制軍 ⁵ 入京。
嘉慶24.7.18	伍祠觀劇。
嘉慶24.7.20	赴伍祠觀劇。

讓讀者更驚訝的是,除了園林和祠堂以外,行商的洋行也成為學人、畫家集合和休閒的場所:

嘉慶25.1.28	到西成 ⁶ 陪陳恕亭飲。過怡和 ⁷ 與五兒手談。
嘉慶25.11.8	到怡和大餐。晚宿西成行。

道光1.11.12 劉樸石⁸、吳石華⁹來，仝出城到天和棧候李漱六¹⁰。飯後到廣利、同孚、同東、天寶各行一行¹¹。順道還齋¹²，即還院¹³。

道光2.4.5 著次兒¹⁴辭退怡和館地。

道光4.6.28 午後還齋；與汪玉賓¹⁵到廣利西棧看戲。晚赴盧鳴(?)圃昆仲¹⁶花船之席。九點鐘散席；還宿廣利行。

幾家佛寺對於當時廣州市上層社會階級也算是很重要的集合與休閒場所。對謝蘭生來說，海幢寺是最常參觀的：

嘉慶24.6.10 海幢赴齋¹⁷。

嘉慶25.9.18 過海幢尋澄公¹⁸、性公。不遇。見漸公，與談禪半日。

尤其在謝蘭生於 1821 年開始任羊城書院山長以前，他常常「過河」到河南，同一日參觀伍家和海幢寺：

嘉慶25.11.2 銘山¹⁹來。到葉祠，會黃春帆²⁰；尋墨池²¹，未遇。再到自在航，會文園²³。隨入海幢。還研北與東坪²⁴諸公會。傍晚登先南²⁵舟中靜坐。

嘉慶25.12.19 楷屏²⁶來，邀往怡和。閱詩卷畢，過海幢方丈午飯。為性公字扇一柄。往候東坪，仝鳳石²⁷、楷屏上花船，赴南洲……。

由此可以看出謝蘭生與行商之間在科學文教上的密切關係。謝蘭生幾次到河南為潘有度的兒姪輩「開蒙」：

道光 2.11.4 卯刻過潘宅為正裕²⁸開蒙。

此外，在潘氏家屬去世的時候，謝蘭生會去潘家致吊唁：

嘉慶25.10.14 過潘宅吊客；遇繡山²⁹先生，少談即散。

不過，最能夠吸引像謝蘭生一樣的學人、畫家的因素，就是他們可以得到機會接近富商所收集的書籍、書畫、碑帖和古玩等物。對於謝蘭生而言，伍氏所藏名畫最能吸引他的注意。此種例子甚多，在此略舉幾個：

道光1.5.11 仝楷屏過研北，會東坪……暨筠如³⁰、鳳石……看宋搨九成³¹宮帖。極佳。

道光1.12.20 入書院一行，即還。過河入海幢。再過研北看畫。又入伍祠看諸畫卷。與東坪到媚川樓，楷屏已先在座。伍氏所藏畫亦多佳者。

道光2.2.23 同鄉黃廷倬來。還齋一行。隨出城到天和棧。又過海幢。與楷屏到研北赴席。看伍君京還所帶銅器、玉器、竹器及各色古玩；甚夥。聽蘇曲。將二鼓方散席。

道光3.6.10 借得伍春嵐清湘³²冊。是葯房³³先生舊物。

道光4.7.10 午後還齋。隨出城到怡和，看南洲所得二樵³⁴青綠畫冊。佳本也。傍晚上花船赴平湖晚席。更後看水陸道場。二鼓還宿興雲³⁵榻。

在節日送禮，也是行商與鹽商用以維持與學人、畫家關係的一種常用方式：

道光2.7.22 季彤³⁶送來萸茶一箱。已收墨一匣，不佳。未收。

道光6.5.3 劉東生行³⁷、盧廣利行送

禮。俱受四色。
謝有仁³⁸ 昆弟送禮，受四色。

有女伴垂花船至者。豈賞音之無人乎？

廣州的寺廟也經常送禮物給謝蘭生：

七月十五日的盂蘭盆會前後，也是謝蘭生的密集應酬時期：

嘉慶25.12.8 海幢寺送臘八粥及齋。
道光5.5.5 大佛³⁹、海幢俱送齋品來。

嘉慶25.7.10 下午過自航，與葉、曹、鄒諸君全赴海幢。經龍山溫氏花船，遇銘山，容齋⁴² 兄在船上……。

道光5.7.10 與衢尊還齋。隨過河到龍尾渡⁴³ 看盂蘭會。

（二）花船與荔灣：季節性的活動

讀者可以從《日記》探索廣州士人的季節性活動。雖然我們從詩集和文集也能夠探索這種活動，但是《日記》形容的更為具體，使得我們感覺到城市紳士來往的特殊節奏。例如，二、三月間看木棉花：

最後再舉一個中秋節的例子：

道光4.2.25 拜客。順道由大北城上看木棉。至大東門，下城。
道光1.3.17 由小北門城上看木棉。循城而北，而西，而南，至歸德門上。一路木棉俱開。

道光1.8.15 ……再到磐石⁴⁴ 舟中聽曲……午後西上，過花船。笛江⁴⁵ 與曾君至。……即與麗生同上鄒君船聽曲。遇銘山，邀來少談。……諸花船歡節爆竹及諸官鐸鼓之聲遠近相(?)聞。是誠太平盛事。加以月色如畫，亦不可多得佳遊也。二鼓後席未散。

在端午節前後，謝蘭生與廣州市人紛紛的到西關的荔枝灣，也經常到黃竹岐⁴⁰ 等處看龍舟競渡：

在此條中，謝蘭生很肯定地讚美他所處的時代。不過，在形容這種活動的時候，謝蘭生偶爾還會表示他對於「俗人」或群眾的蔑視，尤其是別人將破壞他參與的「雅集」以及社會精英與普通市民之間的差異，例如：

嘉慶25.4.30 平湖訂遊荔灣。與楷屏、三弟、暨諸子泛舟吹笛。入柳波，泊松樹下。兩岸黑葉漸紅，楚楚有致。諸姬清歌，觀者如堵。有土人掠龍舟亦來。
道光5.5.2 午後與衢尊泛船入荔灣。大造全熟。黑葉樹之皆紅矣。與主人浩川⁴¹ 談。久之客來者眾，即還。
嘉慶25.5.5 與楷屏同候銘山，約同往黃竹岐看龍船。遊舫甚盛。
道光4.5.24 ……與袁、李二君攜善謳者全往。上亭子唱曲。傍晚亦

道光4.5.27 ……唐荔園作小畫三幅，已定稿矣。雨中遊人絕少，作畫於水亭上極妙。俗人不知其趣也。畫稿將成，忽有來敗興者，即卷畫而行。

（三）市、鄉和宗族

《日記》還給讀者一個難得的機會探索珠江三角洲裏的宗族與廣州的關係。雖然很多人類學

家和歷史學家研究三角洲裏幾個重要市鎮的宗族，⁴⁶但是，已經遷至廣州市裏去的家庭到底在甚麼程度上還與留在鄉下的族人繼續維持聯繫？以我所知，能回答這個問題的具體資料並不多見。而在這一方面，《日記》則能提供讀者幾條很具體的記載。比方說，讀者會發現在一年之內謝蘭生與家人幾次下鄉。在春天，謝蘭生通常帶家人到廣州的東郊行禮，然後派兒子和姪兒到鄉間「拜山」。例如：

- 道光5.2.27 過漱藝⁴⁷，又到三宅⁴⁸，偕同各房出小北，轉大東拜山。
- 道光5.3.5 兒姪輩下鄉拜山。
- 道光5.3.7 兒輩拜山還。

在秋天，謝蘭生親自帶兒輩下鄉到孫屋邊，主要目的即是為了「拜山」：

- 道光3.9.8 約明日往孫屋邊拜山。以今日雨大，不果。
- 道光3.9.10 侵晨下快艇到孫屋邊拜山。船戶阿四。下午還至竹排尾。……更後還怡和，與三弟談至二鼓。

在1822年的秋天，因為謝蘭生的次兒謝念功中舉人，所以此年念功補辦了一次拜山活動：

- 道光2.9.7 晚還齋住宿。為明日要下鄉拜山也。
- 道光2.9.8 早下快艇到孫屋邊拜山。船戶阿魴。……下午到家⁴⁹，
- 道光2.10.11 即還書院。
- 道光2.10.19 鄉間愛常三公與一姪孫來訂廿日全念功還鄉祀祖。次兒本日回鄉謁祖。

一般說來，在形容下鄉拜山的記載中，謝蘭生寫得極其簡潔。但是，在1826年他則描寫得很

詳細，顯示他至少曾經一次在麻奢堡扮演比較積極的角色：

- 道光6.9.9 早到海印閣赴誠齋樵使⁵⁰齋席。已刻到怡和行尾下船，與三弟暨李實園下鄉。將二鼓方至金山⁵¹下泊。
- 道光6.9.10 清晨上孫屋邊拜山。畢，還看冷水坑新開山穴。甚佳。坐坤向艮，兼寓申。已刻入本鄉東向祠堂；李姓族長亦來求和。勸諭本族至午未，乃還船上。……申刻到家。

（四）教學活動與經濟收入

按照《日記》的記錄，讀者可以瞭解到謝蘭生教學活動的實際過程與經濟上的收益。除了羊城書院山長的薪水以外，謝蘭生經常獲致會文的潤筆：

- 道光2.2.21 接新會岡州⁵²會文三百餘篇。允廿日內閱起。
- 道光2.3.10 閱岡州會文畢。
- 道光2.3.22 閱龍山會文。還齋。隨到貢院議石匠事。
- 道光2.3.23 閱龍山會文畢。
- 道光2.4.24 新會潮連送會文至。允五月十七日付與。
- 道光2.5.14 閱新會潮連會文畢。
- 道光2.12.9 東莞謝姓送會文來閱。允十三日付與。
- 道光2.12.11 閱東莞課卷畢。

在讀會文這一方面，還有一條表示著謝蘭生與麻奢堡所維持的關係。下面一條，與上面形容下鄉拜山的幾條可有助讀者了解城市與腹地之間來往的情況：

- 道光2.7.18 麻奢熬峰書院會文來閱。
- 道光2.8.11 閱熬峰書院課卷。

在《日記》道光三、四年中，謝蘭生記錄每個月的當月所得，並且在道光四年十二月寫了當年的總數：

[在道光 3.9.1 的頁邊空白處]：共六十七元。

[在道光 3.12.1 的頁邊空白處]：共二百九十一元。

[在道光 4.12.1 的頁邊空白處]：三百零一。
共一千五百六十二大元。

謝蘭生甄別的會文，其中最多的來自文瀾書院。該書院位於廣州西關的下九甫，建於 1810 年至 1811 年期間，是由廣州十三行行商捐資創建。讀者可從《日記》中發現文瀾書院在 1820 年代經常主辦規模較大的學術活動：

道光3.11.17 到文瀾書院閱詩卷。

道光3.11.19 入文瀾書院閱詩卷。題目：「紅梅拜棕林」。全用十三元。

道光3.11.20 早到文瀾書院閱定詩卷。到最後還齋。

道光3.11.22 文瀾書院送至閱卷，筆潤。

道光4.1.28 送書扇等物為文瀾書院詩社加禮。

道光5.3.5 文瀾書院送至會文六百餘篇。允月底付與。

不過，最常出現在《日記》中的書院卻是羊城書院。此院在廣州老城內龍藏街，建於 1820 年；創建者羅含章延謝蘭生為山長。從此以後，羊城書院成為謝蘭生的學術和日常生活的中心。我們先看關於每年開學參與甄別考試學生的人數：

[在道光 1.1.18 的頁邊空白處]：本日考羊城書院生童，約二千餘人。

道光6.1.18 本日考羊城書院生童，一千五百餘人。

道光9.1.21 生童共二千一百廿四名。

如此龐大的人數給予讀者一種深刻的印象：在接受教育機會方面有很高的競爭性。我們由此可以見識到十九世紀初期廣州在科舉文教上的競爭情況。此外，《日記》也顯示一位書院山長與學生的日常接觸程度：

道光1.2.1 到外館⁵³。諸生來謁者凡八人。

道光1.2.3 到外館。諸生謁者五人。

道光1.2.4 入外館。諸生來謁者四人。

道光1.2.5 諸生來謁者八人。

道光1.2.6 諸生來謁者一人。

道光1.2.7 諸生來謁者四人。

道光1.2.8 到外館。諸生來謁者十二人。

考試的課題基本上不外於《四書》，並且是以程朱的解釋為主。例如：

道光1.3.9 生監題：「仲弓為季氏宰」⁵⁴。

道光2.5.16 生監課題：「君子信而後勞其民」⁵⁵二句。

道光5.2.2 生監題：「約之以禮」⁵⁶。

謝蘭生在羊城書院講演的題目，大體也都在這個「宋儒」學術範圍之內：

道光3.3.26 早講〈太極圖說〉一篇。

道光3.3.28 講〈西銘〉一篇。

道光3.4.1 講程子〈定性書〉⁵⁷。

道光3.4.4 講《學》《庸》《章句》⁵⁸兩序。

道光3.4.10 講《毛詩》序。

道光3.4.12 講孔安國《尚書》序。

道光3.4.15 講杜預《春秋傳》序。

道光3.4.19 講韓子〈原道〉一篇。

從 1821 年秋天起，阮元新建的學海堂，即在治學方法和學術觀點兩方面都明顯地開始影響羊

城書院的考課題目，尤其是在文學方面。例如：

- 道光2.10.24 〈夜渚〉、〈月明〉皆學海堂所領《詩品》題目⁵⁹。
- 道光3.9.9 諸生課題：(二) 擬張曲江〈望月遠懷〉五律一首。詩題本學海堂課。
- 道光6.8.24 生童課用學海堂詩題：(一)〈嶺南勸耕詩〉五古二首⁶⁰。
- (二)〈文瀾閣落成詩〉⁶¹。

從此我們可以感覺到學海堂對廣州學界的影響。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尤其是像謝蘭生這種老一輩學者，由他的態度看來，學海堂已被既有的廣州文化圈所容納，很自然地成為謝蘭生等人的遊覽地點：

- 道光 6.8.15 晚肩輿上三元古觀⁶²，會黃定湖⁶³。學海堂與石華談。此地賞月最佳。

我在本文只提了謝蘭生《日記》中與我研究範圍和興趣有關的幾條文獻。除此之外，《日記》對於廣州地方與全國紳士文化其他的問題，也應該有所幫助，譬如：藝術品的製造、交換和搜集，以及城市社會菁英的組成結構。希望此後可供研究廣州市地方歷史的學者進一步參考。

註釋：

- ¹ 我要特別感謝邱澎生先生仔細地閱讀全文，並提供了一些寶貴的意見。
- ² 「嘉慶 24.7.16」表示嘉慶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以下皆相同。
- ³ 關於伍祠，見 John H. Gray,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De Souza & Co., 1875), pp. 76-78。
- ⁴ 伍秉鑒（1765-1843），南海人。
- ⁵ 阮元（1764-1849）。
- ⁶ 此行是黎光遠所經營。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

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 310-313。

- ⁷ 此行是伍秉鑒所經營。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 282-288。
- ⁸ 劉彬華，番禺人。
- ⁹ 吳蘭修，嘉應人。
- ¹⁰ 李清華，順德人。見阮元：《學海堂集》。
- ¹¹ 盧文錦的廣利行、潘有度的同孚行、梁經國的天寶行都列十三行之內。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 293-296、頁 259-269，及頁 321-326。
- ¹² 指常惺惺齋。
- ¹³ 指羊城書院。
- ¹⁴ 謝念功。
- ¹⁵ 汪浦，番禺人。
- ¹⁶ 疑為盧文錦、盧文蔚。
- ¹⁷ 即齋飯。
- ¹⁸ 契清，字澄波上人，海幢寺僧。
- ¹⁹ 招子庸，南海人。
- ²⁰ 黃位清，番禺人。
- ²¹ 張如芝，順德人。
- ²² 「自在航」，疑為葉氏書畫舫。
- ²³ 葉夢麟，南海人。
- ²⁴ 伍秉鏞，伍秉鑒之兄。
- ²⁵ 先南姓周。
- ²⁶ 黎應鍾，順德人。一說嘉應人。見汪兆鏞：《嶺南畫徵略》，卷 6，頁 11。
- ²⁷ 鍾啟韶，新會人。
- ²⁸ 潘正裕（1818-1891）。
- ²⁹ 張炳文，張維屏的父親。
- ³⁰ 疑為趙允莖，香山人。
- ³¹ 唐宮名，在陝西省。唐魏徵傳〈九成宮醴泉銘〉，歐陽詢書。此碑為楷法之宗。
- ³² 清初僧人、畫家道濟；字石濤，號清湘老人。
- ³³ 張錦芳（1747-1792），順德人。
- ³⁴ 黎簡（1747-1799），順德人。
- ³⁵ 興雲姓張。
- ³⁶ 潘正煒（1791-1850）。
- ³⁷ 此行是安徽人劉德章所經營的。見梁嘉彬：《廣東十三行考》，頁 301-302。
- ³⁸ 東裕行經營者謝嘉梧的兒子。見梁嘉彬：《廣

- 東十三行考》，頁 328-329。
- ³⁹ 大佛寺，在廣州老城內，羊城書院附近。
- ⁴⁰ 黃竹岐堡在南海縣，廣州市西。
- ⁴¹ 邱熙，南海人，荔灣唐荔園主人。
- ⁴² 葉世謙 / 葉毓芝，南海人。
- ⁴³ 龍尾渡在河南，見 Gray,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pp. 83-84。
- ⁴⁴ 疑為陳簡書，南海人。
- ⁴⁵ 熊景星，南海人。
- ⁴⁶ 例如 David Faure, "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 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Modern China* 15.1 (1989), pp. 4-36; Liu Zhiwei, "Lineage on the Sands: The Case of Shawan," in David Faure and Helen F.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43; Hel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⁴⁷ 謝蘭生之兄的住宅。
- ⁴⁸ 謝蘭生之三弟謝觀生的住宅。
- ⁴⁹ 指廣州新城的常惺惺齋。
- ⁵⁰ 指粵海關達三。
- ⁵¹ 在麻奢堡之西北。
- ⁵² 此該指岡州書院。見 1840 年《新會縣志》，卷 3，頁 38。
- ⁵³ 關於所謂的外館，見 1871 年《番禺縣志》(卷 16，頁 40 上)：「羊城書院外館，原名穗城書院、嶺南義學，在城南龍藏街」。
- ⁵⁴ 《論語》13.2。
- ⁵⁵ 《論語》19.10。
- ⁵⁶ 《論語》6.25。
- ⁵⁷ 程顥寫給張載的書信。
- ⁵⁸ 朱熹所撰《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也。
- ⁵⁹ 見阮元：《學海堂集》卷 14。
- ⁶⁰ 見阮元：《學海堂二集》卷 19。
- ⁶¹ 見阮元：《學海堂二集》卷 22。
- ⁶² 三元宮，在廣州越秀山。
- ⁶³ 疑為香山僧人湜雲，姓黃，字定湖。汪兆鏞：《嶺南畫徵略》〈續錄〉在《清代傳記叢刊》第 80 卷（明文書局），頁 36。

華南研究年會

舉行日期：2003 年 12 月 20-21 日

地點：中山大學

專題小組題目（暫定）

第一組

主題：身份認同與地域社會建構

第四組

主題：清代廣州行商與地方社會

第二組

主題：鹽政與社會變遷

第五組

主題：近代中國城市變遷

第三組

主題：明清社會經濟史

華南研究會、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歷史系、廣東省歷史學會中國社會經濟史專業委員會
合辦

查詢：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電話：(852)23587778、傳真：(852)23587774、電郵：schina@ust.hk

僑批經營研究的若干問題 ——從 1887 年廣惠肇文興信局的創辦廣告談開去

陳麗園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華南沿海地區與東南亞間出現了持續而大規模的移民運動，其後果是：一方面在東南亞地區形成了引人矚目的華人社會，另一方面這些海外移民又對華南地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致後者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僑鄉社會。十九、二十世紀的這股移民潮能持續發展並對僑鄉社會產生巨大影響，需靠一種可以有效連接兩地社會的支持體系，其內容包括信息、資金和商品等方面的傳遞與交流。通過研究這些支持體系運作的規模、過程和機制，我們可以對華南與東南亞華人社會的互動關係有更深刻的理解。在兩地社會的互動交流中，信件和僑匯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因此也是管蠡華南與東南亞華人社會互動關係的重要視窗。

由於僑匯對中國外匯收入的作用舉足輕重，

歷年來學者已對僑匯的規模、官方的僑匯政策等問題已有充分的研究，¹但是對於僑匯的民間經營這一主體部分的研究仍然不夠，近年來隨著大量有關僑批局和僑批檔案資料的發現，學術界也陸續湧現了不少研究成果。²不過目前的僑批經營研究除了考察僑批局建立的人事關係及對僑批局和僑批進行統計分析外，有關僑批局的具體運作情況只能根據前人憶述，因此關於僑批局經營的許多問題仍未明朗。最近筆者承蒙香港科技大學蔡志祥教授的慷慨賜贈，得獲 1887 年廣惠肇文興信局在《叻報》上刊登的創辦廣告，³該廣告對僑批局的收費、組織、多業經營等問題都有翔實的反映，這對我們研究早期的僑批經營有極大的參考價值，為此，筆者將不避繁複，將廣告全文轉錄，以饗讀者。

《叻報》，1887 年十月十八日，頁七。⁴

創設廣惠肇文興信局告白：竊以關山難越，誰傳天雁之書，萍梗徒飄空繫河魚之帛，矧復鄉園寥廓，道路紛歧，縱驛使不憚傳□而洪喬幾虞誤事。又況錙銖匪易，付托良艱。此本號所以創興，庶遊子得而方便者也。□者，本號創設在單邊街，寓於文行堂藥店。專代匯寄唐山廣惠肇等處，來往保家書信銀兩，快捷無誤，竊思南洋各埠梓里之旅處者，不乏其人，此中獲貲，欲寄回鄉者，每多可慮。蓋道路既多迢遞，而付寄實甚艱難。且有居鄉之人，則更不便於郵寄。因想閩潮各籍，皆有信館開設於南洋各埠，以代諸戚里匯銀回鄉。惟我粵人則向無此業。是以本號特為開設，仿照閩潮各信館之例，以代諸君匯項回鄉。其信資匯費，無不格外從廉。即遠近鄉落地方，亦無不專人寄到，所有銀兩務須限日交到，且必取回收條作據，庶慰客途盼望之心，並有文行堂擔保銀兩，斷無貽誤。此誠於諸君有便，一則可免訪人托寄，一則可無遺失之虞。而且甘旨不至有虧，倚閭免空懸望，高堂菽水，儘可無憂。倘諸君有賜顧者，尚懇惠臨，不勝幸甚。茲謹將付信匯銀條款，略登如左：

- 一、諸君有付本局吉信者，必要照皇家信館規矩，粘貼土擔，否則本局儘可代粘，該錘若干，照例收回。如寄至香港，則除土擔費外，不取分文。倘要轉付省城四鄉，或各府縣等處，必須公道面商，給回使費與走帶之人。
- 一、諸君付寄銀信，其銀若干，係交某地某人所收，本局收函後，必給回憑單與寄信之人收執。倘有遺失銀項等事，可執此單，向本局追回。

- 一、本局代 諸君匯寄銀項書信，及銀器玩物，均有買殷實保家，以保無虞。
- 一、本局代收 諸君銀信，自叻到香港者，由一元至三十元，則每元取回水腳銀二占。⁵自三十一元至六十元，則每元取水腳銀七鐸。⁶自六十一元至一百元則每元取回一占半。如在檳城匯寄，則寄費加二五算。在小白蠟及吉隆等處匯寄，則加五算。在大白蠟匯寄，則加倍算。⁷如轉遞入省者，則每元加一占。若一百元以外，及往四鄉或遠處，則水腳另議。
- 一、本局代收諸君銀信到香港交者，則限二十天有回頭憑據交與寄信之人。如到省，則限二十五日。其中或有加快，亦屬未定。因恐船期延擱，故特寬限日子。倘過期無收單寄至，則任付信之人，到本局取回原銀，斷無有誤。若取回原銀後，其回頭憑據方到，則前項仍須交回本局收返，以昭公道。
- 一、本局代收 諸君寄往四鄉或外府縣之銀信，必要寬限日期。因道途遙遠，與近埠不同。若果緊急，要本局專人帶往，則道途使費，須當面議。
- 一、諸君付寄銀信，其銀多寡，均不能包在信內，須另包封，候本局看過有無低偽，然後照寄。
- 一、諸君有欲付銀回唐而本人或不能寫信者，可將其信內如何寫法，托本局之伴，為之代寫，亦可。
- 一、本局在各埠分設代理者，如檳城則在大隆號，大白蠟則在毛邊埠廣生隆號，⁸小白蠟則在安泰公司，吉隆則在萬恒泰公司。已[以]上各家均係殷實之人，至香港，省城及各處鄉間，則本局更派親信之伴司理，并有文行堂擔保銀項，斷無失漏之虞。
- 一、本局不惟僅寄銀項書信，并可接單與 諸君代辦各處貨物，斷無貽誤。
- 一、諸君欲托本局代辦零碎物件，不論其銀多寡，須照辦單先收加一定銀，庶昭誠實。
- 一、本局係由 皇家信館分設，原為利便梓里起見，非同牟利者比。故信資特從廉計，以示公平。

大清光緒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文興信局謹啟

以上是文興信局在《叻報》十月十八日號上刊登的廣告，文興信局的創辦廣告最早從十月十四日開始刊登，直到十一月十四日為止，持續了一個月。不過十月十四日的廣告在詞句上與十五日以後稍有出入，其中之一就是在收費上，吉隆坡與大白蠟相同，原文是「在小白蠟匯寄，則加五算。在大白蠟及吉隆等處匯寄，則加倍算。」二是文興信局在吉隆坡的代理商並不是萬恆泰公司，而是璉二新公司。可能出於某些差錯，這則廣告在十五日便在文詞上作出相應修改，並成為以後的藍本，亦即上文。儘管由於資料缺乏，我們無從得知文興信局及文行堂藥店的有關情況，也無法知道這則廣告的刊登會取得甚麼社會反響，不過圍繞這則廣告，我們可以對僑批經營的若干問題有更深的認識並作進一步討論。

第一、僑匯與僑信

僑匯業與僑信業最初是同體共存的孿生兄弟，也就是說華僑在向家鄉寄錢時必附帶家信，反之亦然，因此水客及後來誕生的僑批局對這兩項業務的經營同時並舉，但從廣告中我們發現廣惠肇信局是以皇家信局分局的名義開設的，並在僑匯與僑信業上出現了一定的分離，即寄信有寄信的規矩，要按照皇家規矩粘貼郵票，而寄批（信與錢）則另外有一套辦法。我們尚不知道這時期的僑批局是否必須向政府申請為合法的郵政處，但是郵政業與民間僑批業的瓜葛便已漸露端倪。

政府對僑批業的染指是從郵政業開始的（繼而是外匯控制），至遲到 1914 年中國政府加入萬國郵聯後，英屬殖民地和中國的僑批局均已隸屬於郵政部門。兩者的關係是複雜的，一方面是官

方壟斷與民間經營間控制與反控制的關係（例如 1876 年海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首設華小郵政局時便引起僑批局組織發動的華人暴動，⁹而在民國時期僑批局也試圖抵制政府採取的取締運動），另一方面又相互利用，即僑批局主要負責與僑胞、僑眷有正面關係的收批和發批工作，而不同國家（地區）間的運郵工作則屬於郵政局範圍。這是由於官方郵政業從零開始到遍及全國鄉村的任務是艱巨的，為此它不得不依賴僑批業在基層社會所遍佈的網絡關係。對官方與民間的僑匯（僑信）經營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近代國家形成進程中官方控制與民間商業的緊張關係與合作空間。

第二、僑批局的收費與利潤

前人對僑批局的收費和利潤的研究大多認為，早期的僑批局尚向僑胞收取一定的手續費，但後來由於競爭激烈，甚至連手續費都不收，僑批局的利潤全靠賺取匯率的差額。¹⁰ 這種說法大致上是正確的，但對於手續費的具體情況和僑批局利潤從手續費向匯率差額轉變的過程的概述仍有模糊之處，而該廣告對收費的具體規定則對以上問題的澄清提供了有力的實證。依照該廣告，批局的收費是因匯款額和收匯地而異，大致上，匯錢越多，收費比例越低，從新加坡到香港的收費大約浮動在 1.5% 至 2.0% 間，參見表（1）。另外，批局的收費是以從新加坡到香港為準的，超出此兩地之外的則額外收費，例如從檳城、小霹靂（及吉隆坡）和大霹靂匯寄的則依次比新加坡增加 25%、50% 和 100%，¹¹ 而寄到廣州的收費每

元又比香港多加一分，至於匯寄巨額僑匯和寄往遠鄉僻處的手續費則面議。總的來說，僑批局的收費不算高，低的只有 1.5%，最高的也不超過 5%，這比當時的官方收費來說還是便宜得多，例如 1876 年新加坡政府設立華小郵政局時的收費高達 5%-10%，參見表（1），這說明低廉的手續費是僑批局吸引顧客的重要手段，也是民間僑批局在與官方機構競爭中勝出的重要原因。

該廣告所述及僑批局的利潤問題還隱含著一個重要信息，儘管它明確規定了匯款的手續費，但是對僑匯研究者所關心的匯率問題卻隻字未提。筆者按圖索驥，發現新加坡 1906 年貨幣改革之前，市面上流通的是西班牙銀元、香港銀元和墨西哥銀元等，而這些貨幣當時在香港和閩粵地區也廣為使用。¹² 儘管不同地區的通用貨幣可能不盡一樣，但都可以根據銀的成色按一定的市場價進行折算，因此可以說，在中國和東南亞地區仍實行銀本位的時期，匯率的問題並不重要（或不存在？），¹³ 僑批局的利潤主要還是收取手續費（或對僑匯資金的挪用等）。只有當中國和東南亞所採用貨幣本位出現不同及普遍採用紙幣作為通貨以致各地貨幣間的匯率出現投機性時，匯率才成為影響僑批局利潤的最重要因素，這種情況到戰後民國政府統治下通貨膨脹越演越烈時更是如此，這時賺取不同時段的匯率差價是僑批局發跡的公開秘密。

第三、僑批局的多業經營

從廣告中我們看到文興信局的創立並不是自立門戶，而是「寓於文行堂藥店」內，依此推理，文興信局的老闆是在文行堂藥店的基礎上兼辦僑批業的。僑批局的多業經營是長期以來廣泛存在的現象。究竟兩者的關係如何？對此問題學術界已發生興趣，例如陳春聲曾指出，「正是因為僑批業者這樣的『多種經營』的方式，提高了其在海外華僑中的商業信譽，減少了經營成本。」¹⁴ 此言固然不錯，不過從廣告中我們發現了其他的可能性。

以往我們在探討僑批局與匯款者的信用關係時，常常把它歸結為兩者的社會關係，而問題的

表（1）文興信局與華小郵政局匯款收費比較

1887 年信局收費 （自叻到港）	1876 年郵政局收費 （自叻到港閩粵）
1~30 元：2%	1 元：10%
31~60 元：1.75%	2 元：10%
61~100 元：1.5%	3 元：8%
	4 元：6%
	5 元及以上：5%
100 元以上另議	100 元以上另議

註：關於郵政局的收費參見《星馬通鑑》（星加坡：星加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1959），頁 625。不過匯款額段可能有誤。

實質並不如此簡單，從廣告中我們得知，文行堂對信局的經營起著重要的擔保作用。假如華僑所匯款項出現任何差錯，他們完全可以憑單據向文行堂取回原銀，由此可見，他業商號的擔保對純粹是無本經營的僑批業的早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實際上，他業商號的作用遠遠不限於此，信局的顧客網絡很可能完全依賴該商號所發展的顧客網絡。

分析至此，我們可以說，與移民社會有著「天然」關係的僑批業並不是獨立發展而成的，它至少與華人社會的商業不可分割（文興信局在經營僑批業時還代辦各處貨物和零碎物件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不但如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想，早期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支點便是這些固定商號，它們既是滿足海外華人社會日常生活的貨源地，又是打聽各方消息並與家鄉進行具體的信息、金融和物資交流的場所，因此移民網絡、商業、金融網絡和信息網絡便同在以商號為中心，在華人鄉族性社會網絡的基礎上相互重疊。隨著各行各業的專門化，這些支點並沒有消失，而是增加更多的支點（包括會館、宗親會等），共同構成海外華人社會內部及對華南僑鄉聯繫的一個有機的跨國社會場景。當然，以上只是筆者的一些粗略思考，不過筆者仍然冒昧提出對海外華人史進行整體駕馭的可能性，是因為目前的相關研究仍然囿於某一專門領域，而它們的總和又難以勾勒出海外華人史的整體面貌。

第四、僑批局的內部組織與網絡

對於一個進行跨國性活動的僑批局，其在內部組織上如何統籌管理的問題是僑批研究者所共同關心的。如果我們看廣東省檔案館的相關資料，就會發現汕頭僑批局在國外設有許多「分號」，儼然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跨國商業。不過，據陳春聲研究，這些「分號」大多數只是在僑批匯兌業中有委託代理關係的商號。¹⁵該廣告關於新加坡文興信局在馬來亞各埠所設代理商號的說明也證明了這點，如果我們再翻閱十九、二十世紀東南亞各地出版的刊物，也可發現大量的類似廣告，這些都說明覆蓋中國和東南亞廣大城鄉地

區的僑批網絡是通過代理關係建立的。但是，這樣的代理關係是怎樣建立起來的，雙方的合約如何？則值得進一步探討。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文興信局在說明其在檳城、吉隆坡、霹靂等地設有聯號時，並沒有指出在香港、廣州等地也設有聯號，只是說明將在這些地方「派親信之伴司理」開展業務。我們暫且不管文興信局是否在省港兩地設有聯號，但是根據陳春聲研究，潮幫許多僑批局都是先在東南亞創立，後在汕頭等地分設，¹⁶這說明僑批局的發展是以東南亞為根據地再向華南地區延伸，文興信局的發展大概也循此規律。究竟為甚麼僑批局是以東南亞為重心呢？這主要因為海外華僑的匯款行動是僑批業產生和勃興的根源，因此吸收海外匯款是僑批局的主要任務，而在閩粵內地分發批信款則是前項工作的延續而已。海外僑批局的領導地位到 1940 年代仍然如此，當時國內僑批局分發批信款的工資取決於海外僑批局。¹⁷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政策問題，在東南亞地區，華人創設商號較容易，而在清政府統治下則較難，例如華人歸國遲至 1893 年才受到合法保護。基於以上差別，探討東南亞、香港和閩粵等地僑批局在內部分工和利益分配上的問題是研究僑批經營和僑批網絡的重要內容。

第五、僑批業的方言群差異

從廣告得知，在廣惠肇文興信局創設之前，新加坡的閩、潮幫信局已發展得相當興盛，而粵幫信局仍未有一家，文興信局的創立算是實現了對後者零的突破。根據另一則材料，我們可以更清楚 1887 年新加坡各幫僑批局的情況——潮幫 34 家、閩幫 12 家、客幫 2 家、粵幫 1 家。¹⁸粵幫僑批局相對他幫而言數量之少是一個長期存在的歷史現象，直到 1930、1940 年代我們仍然只看到余仁生匯兌信局、均源匯兌莊、永昌金鋪匯莊等少數僑批局。¹⁹究竟是甚麼原因造成各幫僑批局發展情況懸殊呢？據 1891 年新加坡人口調查顯示，當時粵幫人口（19.2%）是僅次於潮幫（19.5%）、閩幫（37.6%）之後的第三大方言群體，²⁰其匯款數量理應不少，如果他們不是由僑批局轉匯，那麼這

些巨額款項又是經過何種機構如何轉達其廣府家屬呢？如果能對以上問題理清頭緒，相信能對僑批業的整體研究乃至華人商業、海外華人移民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綜上所述，文興信局的創辦廣告一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不少十九世紀僑批經營的具體情況，另一方面又蘊涵了貫穿二十世紀僑批經營的若干重要主題，從中我們發現了僑批經營從十九到二十世紀發展的傳承與變化。僑批經營不是一個孤立的商業問題，而是一個綜合華人社會組織、關係、多國經濟發展和國家控制等問題的複合體，因此僑批經營研究需置於一個跨國性的社會、經濟、政治的情景下來考察，反過來，它也恰恰為我們提供了切入近代跨國華人社會的重要視角。

註釋：

¹ 如林家勁等：《近代廣東僑匯研究》（廣東：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

² 如陳春聲：〈近代華僑匯款與僑批業的經營——以潮汕地區的研究為中心〉，《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4期。

³ 《叻報》（1881.12-1932.3），創辦者為薛有禮，是東南亞地區現存最早的華文日報，在本文研究的1880年代也是新加坡唯一的華文日報，其銷售額不算太多，大約在二三百份左右，但其發行範圍在東南亞地區相當廣泛，是研究早期東南亞華人社會的寶貴資料。（參見何舒敏：〈新加坡最早的華文日報——叻報1881-1932〉，《南洋學報》第34卷）

⁴ 本廣告的註釋皆為筆者所加。

⁵ 「占」為閩、潮話「分」的意思。

⁶ 關於「鐳」的幣值眾說紛紜，如許雲樵認為是0.625分，（《文心雕蟲》【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1973】，頁59），但根據上下文，七鐳應介於二占與一占半間，由於當時海峽殖民地流通四分之一分輔幣，按此推之，「鐳」可能為四分之一分，「七鐳」便是1.75分。

⁷ 「白蠟」即霹靂（Perak），「小白蠟」、「大白蠟」即今天霹靂州的拿律（Larut）和近打縣（Kinta）（參見 *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February 1905, p.186）；「加

二五算」、「加五算」和「加倍算」即在原值基礎上分別多加25%、50%和100%。

⁸ 「毛邊」即“Gopeng”，有時寫作「務邊」，當時是近打地區的重要錫產地。

⁹ 宋旺相：《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1993），頁156-158。

¹⁰ 如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僑匯與民信業研究〉，載《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頁166-167。

¹¹ 從地理上看，檳城、小霹靂（拿律或太平）和大霹靂（近打或毛邊）到新加坡的距離是越來越近，但手續費反而遞增，對此「反常」現象可從當時的交通條件來解釋，檳城由於是海峽殖民地之一，它與新加坡的交通很便利，故收費最便宜，收費地居於中間的太平由於很早就因為開採錫礦而繁榮，且近海，故收費比近打便宜，而後者則在1882年以後才慢慢成為錫產地，由於地處內陸，交通甚為不便，故收費最貴。（參見黃蕓：《星馬華人志》香港：明鑒出版社，1967，頁85-91）另外，新加坡以外的手續費猛增的原因還應考慮代理商號的中介費。

¹² 參見郁樹鋌：《南洋年鑑》（新加坡：南洋報社，1951），頁乙76。

¹³ 筆者曾就此問題請教日本東京大學濱下武志教授，他提出不同貨幣間的匯率也可通過收取手續費來反映，由於資料缺乏，筆者暫且存疑，並希望以後能繼續深入探討。

¹⁴ 同註2。

¹⁵ 同上。

¹⁶ 同上。

¹⁷ 有關閩僑匯兌公會增加批工工資的問題參見《南洋中華匯業總會年刊》，第二集，1948年，（公牘摘要）頁4、9、11、13。

¹⁸ 《星馬通鑑》（星加坡：星加坡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出版，1959），頁626。

¹⁹ 均源莊和永昌金鋪匯莊的廣告參見《南洋中華匯業總會年刊》，第二集，1948年，（論文）頁15、24。

²⁰ Cheng Lim Keak,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ocio-economic Geogra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ang Structur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4.

閩西四保地區所見五種祭文本

劉永華

麥吉爾大學東亞系

四保是位於福建西部長汀、連城、清流和寧化四縣毗鄰地區的一個村落群，總共包括七十餘個自然村。在清代，這裏曾是華南地區相當重要的一個印刷中心。2001年夏至2002年夏，筆者在當地調查期間，先後發現了當地禮生從事儀式活動時參考的儀式文本五種。這些晚清至民國時期的抄本，不僅反映了當地禮生所涉及的各種社會文化活動，而且為我們重構明清時期當地鄉村禮儀的歷史提供了一個出發點。現將這些文本的基本情況作一簡單介紹。

這些主要用於禮儀活動的文本，可能由於其主要內容是大量的祭文，當地一般稱作「祭文本」。其形式類似於臺灣的「家禮簿」¹、香港新界的「禮儀便書」²和山西上黨等地發現的古賽寫卷³。在歷史淵源上，它們也許和唐宋時期的「書儀」有一定關係。⁴撰寫和抄錄這些文本的，是當地稱作禮生的儀式專家。禮生在儀式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假如說儀式是表演，儀軌是劇本，那麼，禮生就是導演。1949年以前，禮生在當地許多地方神祭祀、祖先祭祀、人生禮儀等儀式活動中均負責相之責。同時，他們還在建房、驅疫、行鄉約、祭譜等一系列活動中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⁵以上活動，在這五種祭文本中均有反映。

這五種祭文本，分別搜集於今連城縣四堡鄉霧閣村、上楓村和馬屋村，筆者根據搜集地點，將它們分別命名為文本A、文本B、文本C、文本D和文本E，並將其主要情況歸納為表一。從表中可以看出，這些文本總共收錄有文件1,400多件。

文本A和文本B現由一位元禮生收藏。他在從事儀式活動時，還每每參考這兩種祭文本。據該禮生說，它們以前屬一位監生所有。文本A大約成於晚清光緒年間（1875-1908年），目前保存完好。目錄頁題有「霧閣育英書室鄒種梅抄祭文

廣類」等字，表明抄錄者的名字為霧閣鄒種梅，「育英書室」可能是此人的書齋名，而「祭文廣類」當是該祭文本的名稱。目錄之前，附有兩種禮儀儀軌和三種請帖帖式。這兩種禮儀儀軌，一適用於地方神和始祖的祭祀，一適用於祖先墳墓祭祀。祭文本的主要內容，是按主題編排的。首先是適用於祭祀各種地方神的祭文共44篇。隨後是用於祭祀各代祖先的祭文共136篇。接著是喪葬禮儀祭文共215篇。另外收錄於這個祭文本中的，還有8篇用於驅蟲、驅虎、驅疫的祭文，4篇祭廳的祭文，4篇祭族譜文以及3篇用於新屋上樑的祭文。

表一 四保所見五種祭文本情況表[單位：篇]

祭文本編號	A	B	C	D	E	合計
地點	霧閣	霧閣	霧閣	上保	馬屋	-
抄錄年代	光緒間	不詳	1936年	民國初	民國初	-
抄錄者身份	監生	不詳	不詳	監生	監生	-
神明	44	44	58	79	0	225
祖先	136	85	29	60	11	321
喪葬	215	269	3	238	7	732
龍燈	0	0	2	0	0	2
婚禮	0	0	0	1	17	18
鄉約	0	0	0	10	0	10
契約	0	0	0	12	1	13
其他	24	21	12	34	0	91
合計	419	419	104	434	36	1412

資料來源：本表根據四保所見五種祭文本編成。

文本B目前保存基本完好。據上述禮生說，其年代比文本A稍早。他認為，文本A是從文本B抄錄來的。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兩種文本所收祭文確有諸多相同之處。但是，必須承認，鄒種梅在抄錄文本A時，刪除了文本B中的一些祭文，同時又添加了不少新的祭文。比方說，文本B共收錄了祭祀祖先的祭文85篇，比文本A少了51篇；又收錄有喪禮祭文269篇，比文本A多

了 54 篇。另外，文本 B 共有驅蟲和驅疫祭文 9 篇，廳堂祭文 5 篇，族譜祭文 4 篇和新屋上樑祭文 3 篇。其餘部分與文本 A 基本相同。

文本 C 目前由霧閣村一位對儀式很感興趣的退休小學校長收藏，現保存完好，但下冊已遺失，因此，表一反映的只是上冊的情況。該文本封面題有「祭文本」三字及抄錄者姓氏（鄒國光）和抄錄時間（民國二十五年）。該文本祭文的順序是這樣安排的：首先是 2 篇龍燈祭文，其次是神明祭文 58 篇，接著是 3 篇喪禮祭文，最後是 29 篇祖先祭文。另外，該文本還收錄有請帖帖式 5 種，厲壇祭文 2 篇，廳堂祭文 2 篇，驅蟲祭文 2 篇和禮儀儀軌 1 種。

文本 D 目前也由一位老禮生收藏。像上述那位禮生一樣，這位上梘村禮生在從事儀式活動時，也經常參考這個文本。該文本前四頁已殘缺，最後若干頁已遺失。不過，這些缺失對該文本的統計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影響。據目前的收藏者說，這個文本是由其堂兄抄錄的，後者是位監生。這是筆者至今在四保發現的最為有趣的祭文本。該文本祭文的安排與文本 A 和文本 B 相似，即按照神明祭文、祖先祭文和喪禮祭文的順序。之後是稱呼用語表 4 種，喪葬相關文件 5 種（另有符式 1 種歸符咒類），符咒 2 種，鄉約相關文件 10 種和各式契約 12 種。另有驅蟲祭文 6 種，賀壽相關文件 4 種等。

文本 E 目前由馬屋村一位青年教師所收藏。他說該文本是由其祖父在民國初年抄錄的。他的祖父也是一位監生。該文本目前保存基本完好。文本封面題有「各色祭文吉帖喪帖」及「蘭堦氏抄」等字樣。據現收藏者稱，蘭堦氏是其祖父之號。該文本與上述四種祭文本有所不同。在其中收錄的文件中，沒有神明祭文。祖先祭文和喪禮祭文也分別僅有 11 和 7 篇。另一方面，用於婚禮的文件則有 17 篇。這表明，這個文本的抄錄者可能不是禮生，或者說他是很少參加禮儀活動的禮生。

從這些祭文本中，我們首先可以看到的是，1949 年以前，禮生涉及的範圍很廣。綜合起來，計有以下幾種。

一、地方神祭祀

祭文本所收錄祭文中，首先是神明祭文。五種祭文本共收錄此類祭文 225 篇。當然，這些祭文所對應的神明的數量要少得多，因為不少神明經常有四五篇以上的祭文。以文本 B、C 和 D 所收祭文為例，祭文最多的四個神明依次是關帝（41 篇）、社公（23 篇）、鄒公（21 篇）和天后（21 篇）。這些祭文說明，禮生曾經在地方神祭祀中發揮重要作用。不過，現在禮生已很少參加地方神祭祀，他們的角色已由來自鄰鄉的閩山派道士所取代。

二、祖先祭祀

對祖先的祭祀，一直是禮生參與、贊相的最為重要的儀式。上述文本中，此類文件達 321 種。在四保，規模較大的眾廳（某房公共的正廳）、祠堂和祖墳祭祀活動，大都請禮生引導禮儀過程。在這種禮儀活動中，禮生的位置是獨佔性的，也就是說，其他儀式專家一般是不會被邀請參與這些儀式的。以下是文本 A 所收霧閣鄒氏八世祖葉勝公墓祭祭文一篇：

八世祖考葉勝公鄒老大人墳前曰：恭惟我祖，八世寢昌。祖門老屋，長發其祥。福墳形號，猛虎跳牆。庇蔭既遠，報本勿忘。茲陳俎豆，拜獻穴堂。誠心□□，庶享馨香。

三、人生禮儀

祭文本中包括的人生禮儀主要是婚禮、祝壽、喪禮和葬禮。其中以喪禮和葬禮最為重要，五種祭文本光是此類文件就收錄了 732 件，其數量大大超出地方神祭文和祖先祭文的總和。不過，這並不表示此類禮儀更重要，而是因為喪葬禮儀涉及的社會關係極為複雜，而每篇祭文往往只適用於其中一種關係。⁶ 下面是文本 D 所收發引祭文一篇：

嗚呼祖母，生我父親、我父兄弟，厥有三人。遭家不造，喪亡頻仍。我父與叔，相繼歸冥，止遺不肖。年方數

齡，維祖是依。顧復慇懃，長得怙恃，庶幾有成。胡為一旦舍我穉孫，形影相弔，子立煢煢。今當發引，哭不成聲。奠茲三酌，庶幾來欣。伏惟尚饗。

很明顯，這篇祭文的適用範圍是很小的，它很可能是專門為一位年幼喪父、由祖母撫養成人的死者親屬寫的。

四、鄉約

祭文本中出現鄉約的文件不足為奇，因為在行約之時，一般都需要禮生在旁贊相儀式。⁷而且，四保一些鄉約也從事地方神祭祀活動，這自然也需要禮生的參與。遺憾的是，在四保調查期間，筆者未能發現相關的儀軌。如前所述，文本 D 共收錄鄉約相關文件十種，其中鄉約發佈禁約五種，筆者已有另文專述。茲再抄錄約帖一件為例：

請鄉約帖

伏以

臘去舊除

春來新接乃上保約古設交代約任之良規也謹擇來年正月初二日辰刻敢屈

某字班新鄉約公詣約所領接

聖諭廣訓辯[辦]理約束是望

右啟

請

大鄉望某字班新鄉約公尊駕 / 大人文幾

某字班值理鄉約某名頓首拜

五、其他

祭文本中還收錄了用於驅虎、驅蟲和驅疫的祭文、族譜祭文、龍燈祭文、廳堂祭文、上樑祭文等，說明禮生還參與了驅虎、驅蟲、驅疫、祭譜、祭龍燈和上樑等儀式活動。⁸下面抄錄的驅瘴疫祭文一篇，見於文本 B，它道出了驅疫儀式的意圖：

惟神參贊造化，發育萬物。周竟(境)庶類，悉賴生繁。茲且牲醴，伏惟保障。時災癘疫，莫入吾鄉。魍魎魍魎，遠(?)放深山。蝥賊螟螣，遙赴長江。惡獸逃竄，癘崇潛藏。五穀豐登，百姓沾光。合鄉清吉，物阜民康。不勝感慕，愧我薄觴。伏冀□□，長發其祥。尚饗。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祭譜。四保地區的宗族，每隔幾十年或上百年就有修譜之舉。譜修成後，舉行所謂的「遊譜」儀式，其形式與遊神相似。不過，遊的不是神明，而是一箱箱的族譜。祭譜就是這一活動的一部分，在該宗族祠堂內舉行。同時，每逢清明和冬至祭祖，也有祭譜之舉。族譜祭文，應該是用於這些場合的。此外，祭文本中收錄的一些契約，表明有些禮生還涉足於土地買賣、典當、分家、立嗣等活動。不過，禮生參與這些活動，是因為他們的禮生身份，還是因為他們的其他社會身份（如科舉功名），目前尚難斷定。

祭文本所收文件是從何而來的？經仔細比較，筆者發現，有些祭文與地方誌所載祭文完全一樣。如文本 A 收有一篇天后祭文，內容如下：

惟神菩薩化身，至聖至誠。主宰四瀆，統御百靈。海不揚波，浪靜風平，舟航穩載，悉仗慈仁。奉旨崇祀，永享嘗烝。茲屆仲春秋，敬潔豆馨，希神庇佑，海晏河清。尚饗。

這篇祭文，與光緒《長汀縣誌》所載天后祭文一字不差。⁹祭文本所錄的地方神和始祖祭祀的儀軌，與《明會典》所記載的官方宗教中地方神祭祀的儀軌，在結構上十分相似。這些相似性並不令人奇怪。在明清時期，禮生一般由擁有科舉功名的人擔任，這些人很可能參加過官方的祀典，或者可能接觸過相關的文獻（如通典、地方誌之類）。

儘管在祭文本和官方文獻（如政書）之間有

許多相似之處，官方文獻很難說是祭文本唯一的來源，甚至不一定是最為重要的來源。相當一部分的祭文，無疑是由禮生自己撰寫的。比方說，在祖先祭文中，許多直接寫明是給某某祖先的，它們應該是禮生為祭祀這一祖先專門撰寫的。另一些文件，則可能是從四保或其他地區出版的書籍中抄錄下來的。我們知道，四保在清代是個相當重要的印刷和出版中心，當地刊行了不少禮儀書籍，¹⁰ 禮生在從事禮儀活動時，很自然會注意到這些書籍。比如，上文提到的稱呼用語手冊，即抄錄自四保刊行的一本名為《彙纂家禮帖式集要》的禮儀手冊。文本 D 所收「伏喪重喪三喪日便覽」和「初喪出葬禮重喪法」這兩種文件，也來自此書。¹¹

另一種可能性是，禮生也參考了當地其他禮儀專家的科儀本。1949 年以前，四保地區屬於汀南閩山派和汀北普庵派影響範圍的緩衝地帶。當地的禮生絲毫不受它們的影響是很難想象的。文本 D 收錄有一份「動土符」，其內容如下：

吾奉普庵敕令，動起金、木、水、火、土罡。天無忌。地無忌。人無忌。日月無忌。四時無忌。年無忌。月無忌。日無忌。時刻無忌。諸然[煞]無忌。萬事大吉大利。

符中「普庵」即普庵派祖師。這一符咒，很可能就來自於普庵派文獻，不僅因為符中出現了「普庵」兩字，而且因為它和該派儀式專家目前所用符咒比較相似。¹²

總之，對這些祭文本的簡單考察，給我們這種印象：它們不是對官方宗教相關文獻的簡單複製，因為其中包含的內容，比官方宗教所能提供的東西要豐富、複雜得多。同時，它們也表明，禮生所涉及的禮儀，很難一概歸之於「儒家的」或「士大夫」的禮儀。儘管由於這些祭文本成於晚清和民國時期，我們已無法通過它們瞭解明代和清前期的情形，但是，它們應該被視為明清時期當地鄉村禮儀演變的一個結果。以此為出發點，我們可以通過追溯其中所涉及的主要禮儀的

歷史，瞭解來源不同的禮儀，是如何結合到禮生的禮儀體系之中的。

註釋：

¹ 李豐楙：〈禮生與道士：臺灣民間社會中禮儀實踐的兩個面向〉，王秋桂、莊英章、陳中民主編：《社會、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1），上冊，頁342至343。

² James Hayes, "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81-82; Allen Chun, "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 in the Writing of Custom, or Chinese Marriage from Li to Su," *Late Imperial China* 13.2 (Dec. 1992), p. 82. 據Allen Chun介紹，許舒 (James Hayes) 在香港收集了為數不少的禮儀便書，現收藏於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

³ 楊孟衡：《上党古賽寫卷十四種箋注》（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0），頁3至24。

⁴ Patricia B. Ebrey, "Tang Guides to Verbal Etiquett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2 (Dec. 1985), pp. 581-613.

⁵ 對禮生的歷史和四保禮生在當地社會文化中的作用，筆者的博士論文有專門的論述，這裏恕不贅述。請參見 Yonghua Liu, "The World of Rituals: Masters of Ceremonies (Lisheng), Ancestral Cults, Community Compacts, and Local Temples in Late Imperial Sibao, Fujian" (Ph. 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2003), Chapter III.

⁶ 以筆者在清流縣長校鎮長校村（屬於四保地區）收集到的一本稱呼手冊（抄本）為例，該手冊共收錄了各種稱呼用語共2,981種，涵蓋了社會關係的各個主要方面。

⁷ 四保的梘頭吳氏，在每逢新年交接約務之時，例請禮生參與。見梘頭上祠《吳氏族譜》（1899年刻本）卷八，〈具開祭祖祠規例〉，頁2下。

⁸ 驅虎、驅蟲和驅疫的具體儀式，今已不可考。

⁹ 《長汀縣誌》（1879 年刻本）卷十二，頁 37 上至頁 37 下。

¹⁰ 現任教於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近十餘年來一直致力於研究清代四保的雕版印刷業，在其即將出版的論著中，對此類書籍將有專門的討論。

¹¹ 江浩然、江健資編：《彙纂家禮帖式集要》（成於 1810 年前後）卷六，頁 9 上至頁 10 上。

¹² 參見葉明生：〈閩西北普庵清微等派調查〉，楊彥杰主編：《閩西北的民俗宗教與社會》（香港：國際客家學會，海外華人資料研究中心，法國遠東學院，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2000），頁 443 至頁 446。另一種可能性是，這份符咒來自於土木工匠的手冊，因為

普庵和魯班一樣，也是土木工匠的祖師爺。《魯班經》提到，「凡造作立木上梁，候吉日良時，可立一香案於中亭，設安普庵仙師香火，備列五色錢、香花、燈燭、三牲、果酒供養之儀。」見《魯班經》卷一，頁七上，「起造立木上梁文」，日本內閣文庫藏《相宅造福全書》本（刊於 1600 年前後）。該書複印於 Klaas Ruitenbeek, *Carpentry and Buil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Study of the Fifteenth-Century Carpenter's Manual Lu Ban jing* (Leiden: E. J. Brill, 1996) 書後，引文見頁七 I 28。不過，上引符咒，並不見於《魯班經》。關於普庵和土木工匠的關係，參見 Ruitenbeek 上揭書，頁 68 及頁 164。

活動消息

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合辦
第六屆歷史人類學研究生研討班

日期：2003 年 10 月 11-12 日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永芳堂

2003 年 10 月 11 日（星期六）

第一節（14:00-16:00）

主持：舒萍（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報告人：謝宏維（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

題目：清代至民國時期江西省萬載縣的移民、土著與國家

第二節（16:00-18:00）

主持：陳麗華（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鄭麗美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研究生）

題目：節日與「次」族群認同——香港九龍城潮人社群研究

2003 年 10 月 12 日（星期日）

第三節（8:30-10:30）

主持：覃百榮（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報告人：孫捷（南昌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題目：贛政十年期間（1932-1942）的江西地政

第四節（10:45-12:45）

主持：麥思杰（中山大學歷史系）

報告人：曹雪稚（南昌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題目：對話與對抗：明清時期基督教與江西士紳階層的交往

第五節：圓桌討論（2:00-4:00）

主持：韋錦新（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回憶田野工作

黃淑娉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本文是根據黃淑娉教授 2003 年 3 月 14 日在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主講之「我的五十年田野工作經驗」整理而成，內容作了一些調動和刪節。初稿蒙黃教授修正及補充，不勝感謝。文章整理過程中得馬健雄提供意見、湛蔚晞協助文字處理，謹致謝忱。文章內容若有錯漏之處，皆屬整理者之責任。整理：廖迪生]

人類學對科學的貢獻，來自其獨特的研究方法——田野調查，儘管別的學科也作實地調查，人類學的調查研究還是有其獨特之處。田野工作是人類學研究的「基本功」，通過實地調查得到第一手資料，然後結合歷史文獻、文字記錄、考古材料來進行研究分析，瞭解人類社會。

我從二十多歲開始跑田野，一直跑到七十多歲，最近這幾年遠處跑不了，就去珠江三角洲。五十年的田野調查工作，經驗說不上，但可以談談回憶，與大家分享。我在香港出生長大，1947 年去北京燕京大學唸書，1952 年 7 月畢業。當我還未領到畢業證書，便出發參加調查工作了。那一年，正進行大規模的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各校不招研究生，所以畢業後也沒有機會繼續唸書。我的研究經驗是隨老一輩人類學家學習而累積的。

從 1950 至 2001 年，我的田野工作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 40 年是研究我國的少數民族，後十年是研究漢族，所以我的研究可以說是由「異文化」開始，繼而轉到「本文化」。1950 年，我參加了第一次實地調查，為期兩個半月。這是由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聯合進行的內蒙古實習調查，由林耀華先生率領，參加的有同學和年青老師共 25 人。除了內蒙古之行外，我的研究大都在南方進行，對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前期在兩廣、兩湖、浙江和福建等中東南地區進行，

後期是在西南地區的雲、貴、川。90 年代則主要是研究漢族。

從 50 年代初開始，我們的田野工作就沒有停，也在這裏舉一些例子來說明。1952 年 7 月前往湘西和廣西，翌年 3 月才回到北京，但剛放下行李，東西還沒有整理好，就再出發去福建和浙江研究畚民的民族成份問題了。我們一行三人，3 月去，6 月回來。1954 年 5 月又去雲南，一去便是半年多。那個時候，出差期通常在半年以上。有些男老師還要進行比較長時間的調查研究，甚至一去兩、三年。出發的時候，太太懷孕或小孩子剛出生，出差回來時小孩都會說話了，到晚上小孩問：「媽媽，叔叔為甚麼還不走呀？」雖然我們女老師在出差期間上有些優待，受到照顧，但我們還是很羨慕那些出差三個月便能回家的同事。我們的研究一個接著一個，1954 年底回到北京後，1955 年初便隨楊成志先生去廣東，繼續做畚民的研究。

從那時候開始，若以每十年為期計算，每期我都進行長期及短期的調查工作，曾對蒙古、苗、瑤、畚、壯、侗、傣、黎、彝、哈尼、納西、摩梭、基諾和布朗等十多個少數民族進行調查。我的田野工作，可以歸納為三個研究重點：第一是認識少數民族的不同文化類型，第二是區分民族的標誌，第三是瞭解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方式。當然，在個人感性層面上，自己在田野工作中也有深切的體會。

內蒙古實習調查

正如前述，1950 年夏天，我參加了燕大、清華、北大師生的內蒙古實習調查。內蒙古在 1945 年解放，1947 年 5 月 1 日成立內蒙古自治區，自治區政府對我們做調查的學生和研究者，都給予特別的關照，食宿和旅行費用都不用我們支付。我們首先前往海拉爾，然後進入我國有名的呼倫

貝爾草原。首項任務是接受騎馬訓練，因為不騎馬的話，甚麼地方也去不了。那時候還沒有進行民族識別工作，我們那次的調查對象後來分別被識別為蒙古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和源自西伯利亞的俄羅斯族。我在香港長大，這是我首次看到牧區和獵區的風光，跟牧民一起生活，感覺非常特別和新鮮。我們有時候騎馬，但更多的時間是乘坐兩個大轆轤的牛拉車，在草地上行進。木板車上搭一個拱形木架，圍以毛氈，就成為座位。晚上，我們也會睡在牛車的木板上，真是一物二用。

一個人躺在草地上，望著無際的草原，看著不見邊的天，景色就如詩歌中的描述：「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牧民也教我們唱他們的歌，現在腦海中還有「我們曾有過自由的時光」，「天涯芳草遍牛羊」，「那裏有水草那裏走，我們的家在馬背上」等民歌的餘音。現在跟人類學系的同學談起這些情況，他們都會說：「多瀟灑、多浪漫呀！」其實直到1980年代，我們田野調查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都是頗艱苦的，沒有甚麼瀟灑浪漫可言。

在內蒙古做實習調查時，是我第一次撰寫民族誌。那時候對牧區有很新鮮的感覺，在調查中，初步學習掌握國家的民族政策，培養了對老百姓和牧民的感情，特別是產生了學習人類學的濃厚興趣。我們寫了一個集體調查報告，但當時並沒有出版。1997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將報告出版，書名是《內蒙古呼納盟民族調查報告》，那是47年後的事情。今日的社會已經不同了，但這些實地田野材料也就成為具有資料價值的真確記錄。

湘西、廣西地區

50年代初期，國家要解決國內有多少個民族的問題。1952年夏天，我們幾個同學，包括三個從香港去北京唸書的，沒來得及參加畢業典禮便出發做研究了。我們的第一個目的地是湘西，研究工作開展前，參加了該地成立自治州的典禮，該地初時稱為「湘西苗族自治州」，後來改稱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當時湘西的物質非

常困乏，交通很不方便，從所里(今稱吉首)到古丈的一段，山路非常陡峭，光兩條腿走不成，要用手抓著旁邊的小樹，才能登山。一天要走八、九十里，我當時發高燒，但還是要向前走。選點做調查，然後寫成調查報告。以現在的術語來說，我們當時是去瞭解少數民族的民族文化、去掌握民族文化特點在甚麼地方表現出來。調查報告是集體寫成的，寫好後，交一份到當地政府，交一份給中央，自己也沒有存留報告。

之後，我們轉到廣西，當時廣西要成立壯族自治區，我國除了漢族以外，壯族人數最多，有一千多萬。「桂西壯族自治區」在1952年底成立之前，我們先做調查。後來改稱自治州，至1958年成立了包括整個廣西的壯族自治區。他們早期的族稱是「僮」，為免於與「書僮」的「僮」字相混，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議，改以「壯」字為族名。我們當時在中越邊界、憑祥和寧明一帶進行宣講，向當地百姓闡釋壯族的歷史和文化特點、講解壯族成為少數民族的構成元素。一般老百姓和農民對甚麼是少數民族都不甚瞭解，只知道自己是講土話的；但知識份子則有比較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覺得自己跟漢人是不一樣的。

畚族地區

1953年，正好是50年前，我們去福建廈門漳平研究畚族，一行四人從廈門沿海出發，坐的是一隻小艇。那時候台灣海峽軍事情況特別緊張，經過金門、馬祖時，剛巧正在打砲，小艇進退不得，我們就卡著在那裏，現在說起來，猶有餘悸。

福建的山區比較多，畚族都住在陡峭崎嶇的山區內。我們去漳平山羊嶠調查，「嶠」是小路，「山羊嶠」的意思是指只有山羊才能夠走的路。我們由山底下向上走，路很難行，我們都只顧向上爬，走了大半天。那時候，山上最老的居民只有五十多歲，很多人一輩子也沒有下過山。他們蓋的房子都是杆欄式的，適應炎熱的氣候環境，但人住上面，牲口住在樓下，衛生條件很不好。現在二十一世紀，情況改善了，牲口都在另一個地方飼養。

山上的人需要外邊的鹽，人不吃鹽便活不成。所以過去只要山下的人斷絕鹽的供應，便可以把山上的少數民族封鎖住了。在那次研究，讓我理解了畚族為甚麼老是要遷徙，他們是被迫著走的。由明代開始，他們便自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交界的地區，自粵東鳳凰山，向福建和浙江那邊走。

兩年之後，在 1955 年初，由楊成志先生帶領下，我們去廣東繼續做畚民的識別調查，研究他們是不是少數民族。因為福建、浙江的畚民都說他們的祖先來自粵東的鳳凰山。楊先生領著我們由廣州出發，然後往東走，一直到鳳凰山，調查了 8 個縣十多個村子。

彝族地區

1954 年我們在雲南研究彝族，當時全國申報的民族名稱有四百多個，其中的 70 多個後來被定為彝族。雲南的民族情況比較複雜，研究雲南彝族有三個必須進行調查的地方：一個是小涼山，二是雲南中部，三是雲南東南部彝族跟壯族聚居的文山地區。我參加了這三個地方的調查工作，首先前往文山，然後轉到中部的大理、下關一帶，之後到麗江調查納西族，然後就進入小涼山。我們不可能每天都走路，而且沿途有老虎出沒，可以的話，我們都僱馬幫，騎馬上路。從麗江出發後，要走非常陡峭的山坡，走到「對腦殼」，腳下便是金沙江峽谷，景色壯麗澎湃。我們順著陡坡下山，過了鐵索橋，便到達永勝，該地前稱「永北」，為免「北」字的「敗北」含意，改稱為「永勝」。我們在永勝縣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後，便進入小涼山。當時共產黨領導的政權還未在該地建立，彝族奴隸主各據山頭，外人不能進去，政府也只能在邊上設一個辦事處。我們到了辦事處，便預備針線和毛巾等小禮物，作為送給奴隸主的見面禮。林耀華先生是組長，我們每人配一匹馬，各自管理，便跟著向山上進發。當我們走到他們的山頭，奴隸主便派遣管家接待我們。女性在小涼山社會沒有地位，我能夠跟男的坐在一塊，是因為我是工作組的一個成員。奴隸主要宰一頭羊來招待我們，管家便把一頭羊拉出

來給我們看，林先生說好。他們很快便把那羊宰了，羊肝是烤的，羊肉是大塊的煮，每塊有兩寸見方，肉煮得不太爛，叫「陀陀肉」，是彝族的美食。席上還有蕎麥粑粑等佐食。被稱為「呷西」的奴隸一直蹲在下面，不敢抬頭，當奴隸主或管家高興的時候，便把一小塊蕎麥粑粑扔到他們面前，掉到誰的面前誰就可以撿來吃。

工作組由不同學科的成員組成，有來自歷史學、經濟學、語言學的，但主要的是文化人類學者。我們工作的目的是解決民族識別的問題，找出彝族認同的標誌。小涼山有很長的歷史，但漢人基本上進不去，漢官、流官進不去，土司不能久留。該地保留了彝族傳統文化中比較地道的東西，並使用老彝文。我們當時是要瞭解他們的社會文化特徵，例如他們的奴隸制度、婚姻制度、和語言系統等，書寫彝文也是一個重要的彝族認同標準。但近年一些學者對彝族的研究，都不提彝族奴隸制的問題，我不太清楚他們的依據是甚麼？

縱然漢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剛在 1954 年完成，國家並沒有打算馬上在彝族地區進行土地改革。當時民族工作的方針是「慎重穩進」，不以漢族地區的改革模式套在少數民族身上。在漢族地區，工作組串連窮苦農民，通過他們來開展工作。但在彝族地區，奴隸制之下，我們要溝通奴隸主，給他們送禮物，奴隸主回訪時，我們還從公安局取回大煙——鴉片來招待他們。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主動到奴隸家裏，訪問也只能由他們的管家領著進行，全面的調查就跟本不可能展開。當時負責養豬的奴隸就在豬圈跟豬住在一起，衛生情況之差，令人沒法忍受。而我就是特別愛招跳蚤，不一會兒，跳蚤都往我身上來，弄得我在田野調查時很惱火。後來我才知道，政府還沒有在我們訪問過的地區進行社會改革，這裏卻先發生了叛亂，而一個奴隸主的兒子在參加叛亂時給開鎗打死了。30 年後，1980 年代中，我跟林耀華先生去西昌開會，並訪問大涼山，當地的情況跟我們當年在小涼山所見的完全不一樣了，可以說是換了人間。

傣族地區

在幾十年裏，我在語言屬於壯侗語族的少數民族地區，總共進行了 24 個月的調查，在其他民族地區的研究也有二十多個月。我感覺廣東與百越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對壯侗語族的田野調查，我有著特別深的感情。當我在壯族和傣族地區做研究時，都學當地的語言，方法就是記下他們所說的，不斷的記，不斷的學。我學得比較快，聲調也掌握得比較好，人們都稱讚我說得好，這可能是壯侗語跟廣州話有著密切關係吧！

在田野調查中，我對傣族文化的印象特別深，感情也特別投入。西雙版納的自然條件和地方環境非常好，氣候有一點像廣東的南部，該地是一個天然的動植物園。我說的事情好像很零碎，但實際上，當我們在調查中體會民族文化時，我們除了看見他們的物質文化外，他們的各種社會文化制度、精神方面的藝術形態概念、價值觀和不同的觀念體系等，都不是我們肉眼可以看到的，而是要透過我們親身的經驗去感覺。

傣族的服飾特別漂亮，當車子越過瀾滄江，快要到西雙版納自治州首府景洪時，遠遠的便可以看見穿著裁剪得非常合適的衣服、頭上包著頭帕、下身穿著「桶裙」的窈窕傣族姑娘。漂亮極了！做田野時，我也曾穿上她們的衣服，拍照留念。在傣族農村吃烤魚，雖然樣子沒館子的好看，但是味道卻沒話說。還有那河邊的青苔、各種野生植物、野菜和螞蟥蛋等都很有特色。周恩來總理去傣族地區的時候，他們也用螞蟥蛋來招待他。傣族人很會做小買賣，一到了墟期，就會擺賣東西和熟食。1977 年，「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我在猛海縣的猛遮趕集，那是邊境地區的集鎮，墟期來趕集的便有幾千甚至一萬人以上。

傣族信仰小乘佛教，每條鄉村都有寺廟。他們流行跳孔雀舞，孔雀美麗而善良，是一個吉祥的象徵，孔雀舞表現了傣族美麗、善良、愛好自由的民族性格。傣族地區還有忠誠及愛好和平的大象，一個原始森林裏可以有幾十頭野象，牠們跑起來可以很快，一個小時可以跑六十多公里，牠們就在中國和緬甸兩邊的原始森林中奔馳，傣

族地區的大象改變了我對「大笨象」的感覺。我對傣族文化一直留有很深刻的印象。

據說雲南有 24 個平壩，昆明是第一大壩，第二是猛遮壩，我一個人曾在猛遮壩住了一段時間，那時經常在晚上或半夜時聽到敲打芒鑼和象腳鼓的聲音，雖然敲擊旋律不複雜，但卻扣人心弦，至今每當我一聽到芒鑼、象腳鼓或其他傣族音樂的時候，我便很動感情、很神往。

在傣族地區，我在很多村寨做過調查，他們有很多獨特的事物，都讓我留下深刻印象。例如自治州首府景洪縣旁邊的曼景蘭，便是一個經濟發展得特別快的典範村寨。另一個例子是他們從前的領主和寨子關係，在封建領主管轄下，每個人頭上的每一根頭髮都是屬於領主的，一切都是歸最高領主所有，這個寨子做甚麼，那個寨子做甚麼，每一個寨子都有分工，為領主服役。我最難忘的是曼回寨的個案，過去這類寨子被稱為「琵琶鬼」寨，村民是一些被誣為「琵琶鬼」的無辜百姓。譬如說一個女的，到訪過別人家裏後，人家的孩子就病了，她便可能被污蔑為「琵琶鬼」。「琵琶」在傣語裏是鬼的意思，它會害人、咬人心肝、讓人不得好死。人們會驅趕「琵琶鬼」的家庭，燒光他們的竹樓。這些走投無路的家庭，就只有離開水邊的傣族社群，跑到曼回這類小山溝裏，過著淒慘的日子。1949 年以後，情況當然不同了，但家庭歷史上曾有「琵琶鬼」成員的人還是很難翻身的。譬如，復員後的解放軍是女孩子的理想結婚對象，但是對有過「琵琶鬼」家庭歷史的來說，要找婚姻對象，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拉祜和摩梭地區

雲南地理環境的立體結構是瞭解雲南少數民族的一個重要因素，立體結構的一個向度是氣候，由低地到山上。在夏天，傣族所在的低地，氣溫比較熱，而山上則很涼快，但在冬天，山上就變得很寒冷了。另一個向度是分佈，傣族聚居於低地的平壩上，而有好幾個民族就住在山上。論物質條件，傣族是最優越的，哈尼、布朗、拉祜的情況就差得多了。

1984 年我跟研究生胡鴻保(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一起去研究屬於彝語支的拉祜族和摩梭人，要瞭解他們母系制的區別。我們先去西雙版納，再去瀾滄。拉祜族中有自稱「拉祜納」和「拉祜西」的，拉祜納即「黑拉祜」，親屬組織是父系制，拉祜西即「黃拉祜」，維持著母系制。我們當時集中研究黃拉祜，他們住的地方山巒重疊，沒有甚麼平地，要走好幾個鐘頭才能到達他們耕種的地方，所以他們就在耕地的旁邊，蓋建臨時住房。他們是母系組織，住大房子，在 1950 年代初，當地還有很多大房子，但在我們調查的時候，大房子已經不多了。我跟胡鴻保研究了一個叫紮努、娜波的拉祜家庭，他們家庭成員眾多，除了外出上學和工作的，家裏還有二、三十人，他們的房子是長方型的杆欄式建築，樓上住人，室內分開左右兩側，中間通道有幾個大小不同的火塘，通道兩側分八格，每格之間隔著幾根柱子，沒有板壁，一格就是一對夫婦的「寢室」，中間沒有遮欄。根據我們當時的研究，認為他們正由大家庭向小家庭轉變、由母系制向父系制轉變。

在這個地方調查完畢後，我們就離開瀾滄，經大理，去寧蒗，研究摩梭人的母系家庭。當年，該區的車道本已開通，但剛巧遇上全線修復，車走不通，於是我們請了一個嚮導，帶領我們走路前往。但嚮導帶我們走出一片原始森林後，便掉頭回家去，我們就只好自己向前行。穿過原始森林後，站到高山上，瀘沽湖的美景，就在眼下，美極了！真是久聞不如一見。人說西湖美麗，但它是靠人工雕琢。瀘沽湖寧靜非常，波平如鏡，湖水清澈見底，顏色也特別漂亮。無論你向前看、往後看，或從任何角度欣賞，它都是那麼的優美。高原上的湖景，就正如洛克《中國西南的納西王國》(Joseph F. Rock. *The Ancient Nax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一書中的驚嘆：「這簡直是神仙住的地方。」縱然很多電視片和電影都誇說拍得了瀘沽湖的美態，但無論他們如何運用鏡頭和角度，都掌握不了它現場的美。在瀘沽湖邊上有一些村子，當年我們去的時候，衛生不太好，

經濟收入也不理想。最近幾年有些發展，現在是一個旅遊景點。

我們去摩梭地區的目的是想看一下，增加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感性認識，好跟拉祜族做一個比較。但初期我們的調查不易進行，當地人不滿意有些研究者對摩梭人婚俗過份渲染。幸好我們有一位剛跟摩梭姑娘結婚的普米族學生，我們就由他們倆領著做研究，調查摩梭的不同家庭類型。我們著重瞭解他們的現實情況，譬如當地的單行法規如何解決配偶的結合與認同所生子女出現的矛盾，例如一個女的懷了孕，男的不承認，那麼誰是小孩的父親呢？法院又怎麼判呢？我們調查後知道法院第一是聽女方怎麼說，第二是聽群眾的意見，因為走訪的人晚上來，周圍的人都是知道的。又如改革開放後在發展生產，發家致富的過程中，母系大家庭與小家庭所起的不同作用，母系家庭的發展趨勢等都是我們研究的題目。

1980 年我和庄孔詔等三位研究生去了基諾山和布朗山，這兩個地方也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基諾山離景洪不遠，方圓五百里，那時當地約有一萬多人，那裏的山坡也是非常的陡。我當時已經是五十歲了，大家都要拄著棍子，才能爬上去。那裏沒有平地，更不能用拖拉機耕種。他們沒有種菜，吃的是野菜，也沒有多少肉吃，只養有幾隻雞。基諾人非常熱情的招待我們，我很欣賞他們的螞蟻蛋煮野菜湯，當地的螞蟻比較大，它們的蛋如黃豆一樣，非常鮮美。他們的松鼠乾煮湯也很美味，非常特別。但三位同行的研究生都怕這些食物，他們都不願意品嚐。

布朗山上的拉祜族，女子上身都不穿衣服，她們覺得很自然，但我們自己就看得不好意思。她們都剃光了頭，有稱「光頭拉祜」。她們穿的裙子，有點像傣族的服飾，但比較短，也沒有傣族的那麼漂亮。總的來說，他們是比較貧窮的。要理解少數民族不同的人文類型，我們要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去掌握。他們的日常生活，是我們要關注的一個重要地方，這也是人類學者之所以強調田野工作的原因。

田野工作的艱辛

我調查的少數民族，多分佈在高寒山區，交通很不方便，通常我們去的地方都沒有外面的訪客。楊成志先生曾說：「人類學的路是靠兩條腿走出來的。」早年我們就是用兩條腿走，背著行李、帶著被子去跑田野。那個時候，少數民族一家人都是睡在火塘旁邊，天氣冷了便靠近火塘一點，也會不時翻身來取暖，他們也不會有多餘的被子來招待客人。我們就是背著行李走，通常可以坐車到縣城，但離開縣城後，便要開始長途跋涉、翻山越嶺了。我們的裝備是一個部隊用的背包，一件由頭頂穿下來的部隊的雨衣，一頂草帽，腳下是一雙布鞋，後來有了解放軍穿的膠鞋和一雙半筒的雨靴。那時做田野研究，除了筆記本以外，便沒有其他的記錄器材。當時國家很窮，一部德國的照相機便要兩千多元，一個組也只有一部，個人用照片做田野記錄是一個奢望。我們那時候很羨慕地質隊員，他們也是到處跑，但裝備卻比我們好得多。

跑田野就是要走路，如果能夠有馬代步，或請馬幫帶運，人就沒有那麼累。但騎馬也是很累的，例如從雲南的硯山到富寧，地圖上沒有多遠，現在坐車很快就到了，當年我們騎馬就走了七天，每天早上天亮就起來，一路上也沒有賣東西的攤販，我們輪流煮粥，沒有甚麼乾的可以吃，起來吃了就走。那裏是熱帶氣候，經常下雨，騎在馬上，一陣子下著傾盆大雨，一陣子就曬得熱騰騰的。下雨的時候，穿了雨衣也沒有用，如果穿上半筒雨靴，靴裏頭便全是雨水。但不管是甚麼情況，我都騎在馬背上不下來，因為下來走路的話，人就更累。在雲南北部，有馬代步，人的精力就好得多。但北部山路崎嶇，走的都是凹凸不平的石頭路，馬在石頭縫隙之間走，有時候走的一邊是山，另一邊是懸崖。但我們當時很年青，不知道害怕，也從沒有想過會掉到山溝裏，只是一心一意向前趕路，要完成工作。現在偶爾在電視或報紙上看到旅遊意外事件，我們幾個當年一起去做調查的同事就會說：「那時候我們怎麼沒掉下來！掉下來就完了！也就沒有今天了！」

年青時跑田野，要帶被子。不過被子也就是馬鞍，我們很會打行李，將油布鋪到地上，然後把可以擠壓的東西都放油布裏頭，然後把周邊摺起來，搭到馬背上，便成為馬鞍。這便是我們騎沒有馬鞍的馬所發展出來的技術。

我們女性跑田野要面對一個簡單但重要的問題，就是在那裏上廁所。山區沒廁所，更不要說一個沒有遮蔽的廁所，無論你蹲在哪兒上廁所，人家都會看見。那時候我想了一個辦法，就是穿著長雨衣上廁所，解決這個基本問題，人家看見了我也不管。

在早期的田野工作中，吃始終都是一個問題，在 1950 年代初的調查組裏，吃飽也不容易。當時組裏大多是男生和男老師，他們吃得快，我老是吃不飽。後來我想了一個辦法，第一次隻盛半盅飯，我們是用漱口盅盛飯的，吃半盅就比較快，可以首先添飯，這樣，我便能夠吃飽了。當時也沒有甚麼菜，只有辣椒一類的東西。雲南的大頭菜很好吃，我就自己買一點大頭菜，並把它切好，但吃的時候也不敢張聲，怕別人批評我不適應。我就把切好的大頭菜，偷偷的放在手心，在吃飯時放到飯裏。

少數民族地區的老百姓非常熱情，我們做調查不用發愁。1988 年在廣西賀縣瑤山馬窩村做調查時，住在一位「苗王」的家，他說：「你們需要瞭解甚麼，都包在我們身上。」他們總是拿出最好的東西來招待我們。到 80 年代初，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溫飽問題還沒有解決，做調查也還是相當困難的。1980 年我與莊莊孔昭等三位研究生去布朗山，當地的公社書記千叮萬囑叫我們不要到老百姓家裏吃飯，因為他們負擔不起。我們就在公社的廚房弄早飯，早上八時多吃了便出發，到了晚上九時回來，早上吃的飯也不知在那裏了。研究生中的程德祺來自農村，本是一位民辦教師，考研究生時，英文和俄文都考了九十多分，他寫得一手好文章，後來成為蘇州大學的教授，但很可惜他兩年前去世了。他在布朗山做田野時對我說：「黃老師呀，我是農村來的，習慣吃飯吃得多，這樣不成的！」那個地方有小賣部，但賣的主要不是食品，當地唯一能夠拿出來

賣的剩餘產品就只有一點長得很小的西紅柿。

人類學者要有適應各種環境的能力，對生活和事物有廣泛的興趣。我就曾經吃過醃了十八年的肉，同行的人都不敢吃。我覺得我們到一個地方，就應嚐一下當地的美食。我們到福建畚族地區做研究時，當地人請我們吃黑皮蛙，他們捉了黑皮蛙，不用宰，把蛙兒在水裏洗一下，煮了便給我們吃，同事都不吃，我就吃了！有些民族喜歡用埕子醃魚、蝦和一些剩肉，經過很長時間才拿出來吃，是一種美味食物，我吃了以後也覺得好吃。我喜歡品嚐各種各樣的特色食品，做一個人類學者，要養成不挑食的習慣，縱使有些東西我們覺得不能進口，也應該嚐一嚐，這才知道那是甚麼味道，知道人家為甚麼喜歡吃。

「文化大革命」時，我所有的調查資料都丟失了。「文化大革命」開始沒多久，我們就去了湖北幹校，生活在一般人所理解的「田野」裏。幹校前身是一個勞改農場，之前的勞改犯都遷到其他地方。我們到了後，當地的老百姓都好奇的問我們：「你判幾年呢？」

去幹校的也有老一輩的學者，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等先生跟我們在同一個連隊。稍後，吳文藻先生的太太冰心也來了，我們都在一起勞動。有幾個月我在廚房做飯，同組的費孝通先生負責做饅頭，我就炒菜。費先生做的饅頭特別大，很鬆軟的。當我炒菜時，人家便說：「今天是黃淑娉炒菜，你要把那個菜炒得綠綠的，要看到油水！」那時一個月每人平均只分配半斤食油，要把菜苔(菜心)炒得綠綠的，需要有點技術！

田野工作給女性帶來不少困難，我的一些女同學在畢業後很快便結婚了，結婚以後就生孩子，生了孩子就不能跑田野了。我就是不願早結婚，結了婚也不能馬上生孩子，我有一個兒子，是三十多歲才生的。有一次在中老邊境進行田野研究，兒子滑冰摔了腿，我很擔心，但我不能即時坐飛機回去，真是沒辦法。由於田野調查時間長，每次回來後都覺得身體上有很大的虛耗。此外，自己還要克服家庭和感情上的困難。我一個人離開香港到內地，這幾十年，香港的家人都不在左右。80年代末遷回廣州，很高興終於能靠近

香港一點，但家裏人卻已經先後移民外國了。改革開放後，我回香港探親，但父母親卻已經逝世，我感到很悲痛。我是臺山人，但是臺山也沒有親人。香港是我的故鄉，發愁時會想香港的家人，夢境裏出現的，就是小時候在香港居住的地方。自己要克服家庭、感情上的這些矛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結婚以後，我先生和兒子對我的研究是十分支援的，但我這一輩子也只能生這一個孩子。我常說：「我一個女的，如果要做事情，第一便不能多生孩子，第二不能把自己弄得很窮，因為我們的工資很少，太窮的話，也沒有心思去做甚麼研究！」總的來說，我經過了幾十年的學習和工作，雖然業務上沒有多少成績，但是田野調查工作，卻讓我的思想得到很多鍛鍊，田野的經歷激勵了我對人類學事業的終生追求。

我覺得從事人類學研究的，必須重視理論的學習和研究，並且將理論結合實踐。理論是一個學科知識結構的核心，有了理論，我們才能夠駕馭搜集回來的資料，要不斷的瞭解這個學科發展的趨勢，才能知道自己該怎麼辦。田野調查是很微觀的研究，容易迷失，我們要在宏觀的視野下做微觀的研究，才会有成果。在人類學的棋盤裏，我們是哪一顆棋子，要起甚麼樣的作用？我們要抓得準的話，理論上就必須要領先。

中國的人類學被取消了30年，我曾為所從事的學科的坎坷命運、為作為人類學者經歷過的蹉跎歲月深感惋惜。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本來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常為我國人類學的這些損失感到遺憾，但對自己走上探索人類學奧秘的田野之路，始終無怨無悔。

許多前輩都不顧艱辛，堅持人類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持續到改革開放之後。現在中國人類學正在復興，但根基還是非常脆弱。一些前輩已經離去，一些也老了，我們這個年齡的人有責任把棒接過來，交給下一代。我們要繼承前輩的這個事業，為中國人類學的發展努力。現在是中國人類學發展歷史上最好的一個時期，我要為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為中國人類學的發展盡一分力量。

從路邊到展廳——碾布石

香港歷史博物館民俗組

香港歷史博物館於 1996 年出版的《市影匠心：香港傳統行業及工藝》展覽圖錄中（頁 96 至頁 97），曾刊出一張十九世紀的水粉畫，畫中描繪工匠腳踏「元寶石」，手扶木棍借力平衡，石下有一圓木作滾軸，布匹從兩者間經過，似正以大石的重量來壓磨經浸染的布匹。坊間對此「元寶石」的文字記載甚少，¹其中 Rudolf P. Hommel 於 *China at Work* ² 中曾圖文並茂記錄 1930 年代於江蘇所見「元寶石」的外貌、構造及運作。

尋寶

2002 年 1 月歷史博物館民俗組接到一位熱心市民的來電，告知於黃大仙地鐵站附近發現有「元寶石」棄置路邊，甚感可惜，希望博物館可跟進瞭解情況，並安排收為館藏。館方接報後遂往該區「尋寶」，幾經搜尋，於黃大仙竹園村尋得「元寶石」。

博物館職員(以下簡稱為「筆者」)在村內小徑邊發現那塊「元寶石」，旁為去水溝渠，而石的底部早已陷入地下，成為溝渠壁的一部分，只剩餘頂部石臂伸出地面，狀如一對羊角。該塊「元寶石」為花崗石打成，全長約 150 厘米，高 50 厘米(其中 25 厘米陷入地下)，石臂每邊各長 70 厘米。(見照片一)

尋得「元寶石」後便要尋訪物主，但見村內人跡疏落，不知從何入手之際，有一位先生自屋中出來，帶著詢問的眼神望向筆者，經道明來意後，該先生亦很樂意提供有關「元寶石」以及竹園村的資料。該位周姓先生家住竹園村已歷四代，昔日村內以林姓居多，更設有祠堂及天后廟，周氏早年也為林氏養牛，但林氏近年已相繼遷出。而當下所見的「元寶石」原屬村內「廣隆安」染布廠所有，其作用是如熨斗般將布匹壓平。染布廠為雷姓商人投資，由譚姓家族經營，當年所出產的布匹更引來不少明星青睞。時至今日，「廣隆安」已不再經營染布生意而轉行為賣

雜貨及小食的士多，但仍由譚氏經營。在周先生提示下，筆者聯絡到物主，並得到他們對保護文物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意將那塊「元寶石」送予博物館。

碾布石

碾布是染布過程的工序之一，而碾布石以麻石打成，目的是利用石塊不平滑（未經刻意打磨）的表面及重量，將已浸染的布匹的表層磨壓得幼滑明亮，亦令布質堅韌、輕薄及透氣。

其中最令筆者感到好奇的是如何操作如此偌大的一塊碾布石。筆者曾出示《市影匠心》及 *China at Work* 的插圖向物主請教，以求證碾布石的構造及操作方法。但據物主所述，原來碾布石並非單獨一人可操作，在「廣隆安」操作一塊碾布石需要三名工人，分別負責踏石、協助推石及抽動布匹，故碾布屬人力密集的工序。

為了令筆者更了解碾布石的操作，物主找來了一張攝於 1950 年代的黑白照片，照片背景是「廣隆安」的碾布房，該處應有四塊碾布石，照片中央見兩名工人正在操作其中一塊碾布石。(見照片二)據物主仔細講解，照片中的碾布石狀似元寶，伸出的兩臂為工匠踏腳之處，左右搖踏以磨壓布匹。但用作平衡的扶手，應為「雙枝」（狀如雙槓）而非「單枝」。另踏石工人除了要左右搖踏外，還要以「之」字的步式向前移動壓磨布匹，這解釋了扶手木棍的長度。由於移動石塊耗力不少，故需要另外一名工人從旁協助，但物主強調，無論是踏石工人或是推石工人，都是以技巧順勢「就力」移石，而非只靠勞力的。照片的右方見第二台碾布扶手架，而踏石工人腳後另有一塊體形較少的碾布石，石底綁有木板，據物主憶述，大的那塊碾布石多用來碾壓絲布，而小的那塊則用來碾封口較窄的綿布「大成藍」。

照片中雖然沒有出現調布工人，但據物主補充，其實碾布石底應有凹槽，配合石底的圓形木

輓，將布匹分段滾動磨壓，另布匹之下墊以木板，作為承托及保護。碾布時調布工人需坐於石旁協助移動布匹及不時噴水，使經「過漿」綳摺了的布匹軟化而可容易地被攤開。

「廣隆安」及「永源絲織廠」

照片所示的碾布情況只是「廣隆安」漂染廠眾多工序之一，從探問碾布石的操作過程中，筆者還認識了「廣隆安」及漂染行業的背景及運作。

據物主譚氏講解，位於竹園村內的「廣隆安」，早於戰前 1930 年代已經營漂染布匹的生意，其源頭可追溯於廣州的祖廠，兩廠皆為雷氏投資。譚氏祖籍廣東新會天河，譚父十三歲自新會到廣州，曾拜師學做裁縫，於雷氏的漂染廠打工，甚得賞識，1930 年代受託打理雷氏於香港的分店「廣隆安」，經營漂染生意，布源亦是來自雷氏投資的「華藝織布廠」。據說全盛時期竹園及黃大仙區內大大小小的染廠凡十數處，好不熱鬧。日佔時期為逃避戰火，「廣隆安」停業，譚氏亦舉家遷回新會，「廣隆安」的廠房改為養豬種菜的農地。³

戰後譚氏回竹園村重建「廣隆安」。由於「華藝」已結業，譚氏便自立門戶，投資開設「永源絲織廠」，一手包辦織布、染布、碾布、批發及零售各工序，而照片二左下角碾布石旁便出現了當年「永源絲織廠」膠袋的模樣。

戰後譚氏經營的織布及染布廠更具規模，是區內繼黃大仙廟後第二個鋪設電燈及電話的用戶。織布工場樓高兩層，內設有帳房及工人宿舍；染布廠建有多格高約一米的染布池及以荔枝木製成的曬布棚，而專程訂購自廣州的碾布石也有七至八台，分別擺放在碾布房及曬布空地處。染布是耗水量大的工序，「廣隆安」的水源來自區內的兩口水井，一口為村內的食用井，特別「好水」，另一口則是自挖的，故六十年代當香港鬧水荒時，染布廠的運作也不受影響。

織布及染布廠內共有幾十位工人，有趣的是，不同工序的工人與譚氏有不同形式的僱傭關係。總括來說，譚氏於「永源絲織廠」及「廣隆安」的角色就如「大判頭」般，負責統籌織布、

過漿、染布及碾布的各組工人，而不同的僱傭關係亦反映於膳食、住宿及生活習俗上。

「永源絲織廠」僱用的全是年逾三十歲以上的順德女工，人數未明，有家室子女的，也有梳起不嫁的「自梳女」。這些順德女工們住在「永源」的宿舍（即現在消防局位置），自行安排膳食（她們有些「吃齋」的），工資以件頭或碼數計。她們拜七姊和觀音，每年農曆六月十九日的觀音誕會放例假，並請歌者來唱「觀音出世」，十分熱鬧。織布廠二樓「漿間」住了另外一家五口的順德人，承包「過漿」的工序，專門負責將待織製的絲線加工浸掃漿料，令絲線更堅韌。

而「廣隆安」染布廠則僱了約廿名工人，多為廣府人，「吃飯時也要分兩枱」，另有廚房一職專責膳食茶水。碾布的工序也是承包的，故膳食也會分開，廠內有碾布師傅四至六人，來自南番順鶴山，他們的地位較其他工人為高，收入也較豐，年尾更可分「炮金」。染布及碾布的工人並沒有行神，但每逢初二及十六會拜土地，「吃飯時會加餸」，農曆六月十三日師父誕則會放假。

多年來「廣隆安」及「永源絲織廠」出產的皆是絲綢，分真絲和人造絲，而兩種絲料須要不同的處理方法。簡單來說，真絲以呎計，織紋呈直間，布質較厚硬；人造絲以碼算，織紋呈橫間，質感較輕薄堅韌，兩者皆可織出暗花及作碾光處理，而「永源」出產的以人造絲居多。

絲布織好後便交往「廣隆安」作漂染處理，當中涉及不少的人力技巧及化學加工，譚氏和筆者一一分享。由染料開始，「廣隆安」用的是名為「捻仔樹」的植物染料，布匹多染成黑色。值得一提的是，要將布匹染成純黑色的工序是很繁複的，布匹必須經多個不同顏色（例如紅色）的漂染池「打底」後，才能染出全黑色的效果，故「廣隆安」便建了八個高約一米的漂染池，分別注滿不同顏色的染料。

經漂染的布匹會掛在曬布棚架上或運到空地上晾曬。其中晾曬真絲時需再塗抹多層的醋料及「捻皮」上色，由於塗抹時需要較大的空間，當年「廣隆安」便覓得慈雲山觀音廟及鳳凰新邨一帶（即現在的竹園北邨及聖母醫院）的空曠草地上

晾曬，因該處地面「夠平夠大」。布料晾曬後便搬到碾布房，正如之前所說，由三名工人分段放置到碾布石下灑水磨壓，由於碾布石每次可處理的布匹面積有限，故每匹布都需要來回多次不斷碾壓，才可達到理想的效果。

布匹經碾壓後便會被摺疊成一卷卷，稱為「捉布」，然後再放進兩層高的木匣內以炭火烘乾。之後「車布頭」穩定布邊，印上布匹的名稱、「永源絲織廠」和「廣隆安」的標記後才會正式出售。

譚氏一再強調「廣隆安」出產的是上乘絲綢，戰前主要漂染「官紗」（人造絲）出口往星加坡，價錢比真絲平，當地的「媽姐」、石礦及樹膠工人喜愛買來做成褲子，以其質地幼滑通爽，適宜當地濕熱天氣；在香港只有在文咸東西街作少量零售。另外「廣隆安」亦有漂染深啡色絲綢用作縫製壽衣，又自深水埗接綿布來染製「大成藍」，然後再轉售往廣州。訪問期間，譚氏便向筆者展示「廣隆安」的出品，並介紹了不同顏色和織花紋飾的布板，以及用「廣隆安」布匹製成的衣裳樣本。

到了戰後的四、五十年代，因海外批發市場銳減，「廣隆安」便轉投經營本地零售，幸好布匹亦同樣廣受本地市場歡迎，更贏得「黃大仙綢」的美譽，當年有不少「媽姐」及「齋姑」慕名前來買布做褲，也有富泰的太太訂購布匹來供奉僧尼。

但五十年代之後香港漂染行業漸趨現代化，引入機械，人手工作坊的經營模式相繼被淘汰，再加上漂染工人年事已高，青黃不接，「廣隆安」遂於七十年代後期轉營為士多，「永源絲織廠」亦變為民居，漂染缸填平了，荔枝木製的晒布棚架也扔掉，而多塊的碾布石早已長埋地底成為地基，現只剩下路邊的那塊碾布石在見證昔日的繁華。

從路邊到展廳

由於物主願意捐出棄於溝渠邊的碾布石，搬運當日館方特別安排了專業搬運公司在小徑的路段鑿地取石，用機械吊臂小心翼翼地將石塊送上

貨車運走。碾布石抵館後隨即展開清潔，並進行登記的手續。剛巧展覽組當時正籌備「香江點滴——回歸五周年新增藏品展」，館方便安排碾布石在此展覽中「首展」。為豐富展覽陳列的故事性，館方更向譚氏借來「廣隆安」漂染布帛的色板，於碾布石旁展出。

展覽後譚氏更慷慨捐贈出布帛的色板一塊、深藍色「大成藍」及啡色綢布共兩匹予歷史博物館。其中啡色綢布的布邊印明該布名為「真靛三缸青」，是當年外銷南洋用作製壽衣的衣料，另亦印有負責織製及漂染布匹的兩個商號的標記——「永源絲織廠出口——香港九龍城竹園村源字商標」及「廣隆安」。（見照片三）

註釋：

¹ 筆者曾於互聯網作搜尋有關碾布石的資料，其中尋得以下網站，但只顯示了碾布石及石轆的形象，並沒有文字介紹 www.randdf.com/digimuseum/tool/E/01/02/03/E-01-02-03-080-left.htm。

² Rudolf P. Hommel, *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Whose Life is Toil, and thus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37), pp. 191-278. 該段記錄詳見節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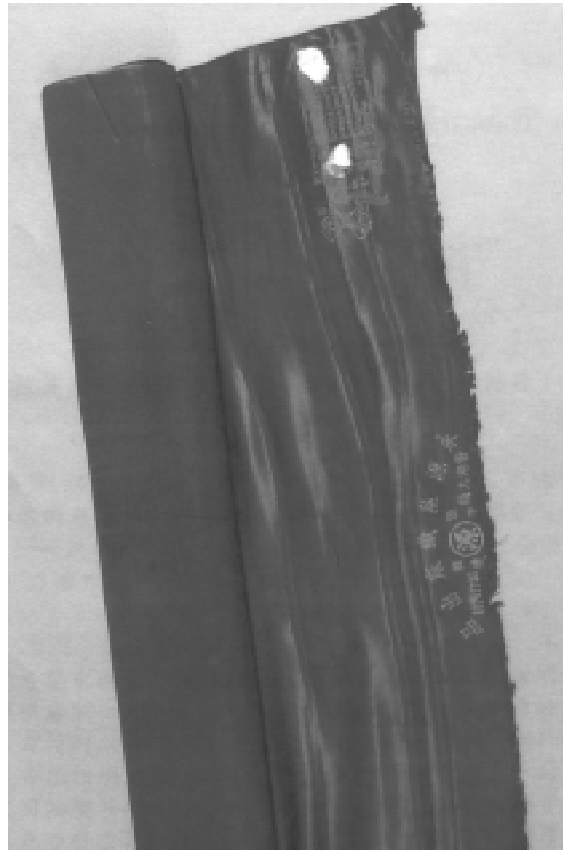
³ 有關竹園村的歷史背景可參考《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 1957-1982》頁 16 題為〈十三鄉今昔——竹園鄉〉的文章。



照片一



照片二



照片三

節錄一

Rudolf P. Hommel, *China at Work*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37) pp.191-278

“There are three essential parts requisite for the process of calendaring freshly steneilled or one-color dyed fabrics: a stone base plate, a wooden roller and a peculiarly fashioned heavy stone which is placed upon the roller to move it back and forth upon the base plate. They can all three be seen in Fig. 278.

The heavy notched stone, shown tilted on its side, is 29 inches high, 2 feet wide at the flat bottom and 13 inches deep. Enough is seen of the base plate to perceive that its upper surface is concaved into a flat trough-like hollow, in which the roller of very hard wood can freely roll back and forth. The roller is 20 inches long and $3\frac{1}{2}$ inches in diameter. A few feet of cloth are laid under the roller on this curved base plate, brought over the roller and folded over on the side where the rest of the cloth bolt is lying. Then the heavy notched stone is tilted upon the roller so as to move the latter back and forth until the strip of the cloth under pressure shows the desired gloss.

The apparatus is operated by a bare-footed worker who jumps on top of the stone and with one foot on each of its horns dexterously does the tilting. To keep his balance he holds on to a horizontal bar fastened at a proper distance over the stone. It is really remarkable to see with what ease the worker pedipulates this heavy stone. Fold upon fold is thus fed under and over the roller until the whole bolt has been calendered. Each time a new part is ready to be shifted in, the worker tilts the stone on its side and rearranges the cloth.”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讀者回條＊

_____更改地址

_____新訂戶

姓名(Name) : 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 :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 :

電話(Phone) : _____

電子郵箱(E-mail) : _____

* 上述資料只用作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系統通訊之用。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三十三期

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會 編

華南研究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五日

執行編輯：馬木池、黃永豪

編輯委員會：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 清水灣

香港科技大學 華南研究中心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Editorial Board

c/o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23587778 (852)23588939 傳真：(852)23587774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 網頁(Web Site): <http://home.ust.hk/~scenter>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華南研究資料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必須為從未發表的文章。
- (五)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六)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七) 本刊不設稿酬。
- (八)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九) 本刊編輯委員會成員：
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
廖迪生、程美寶、馬木池。
- (十) 收稿地址：
 -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編輯部
馬木池先生收
 -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系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陳春聲先生收